



# 革命人

# 張永儒

一耽學堂  
整理

善克也信爾爾我過

抱不爾子又

爭解心  
痛榻不即

漢  
斗  
萬  
千  
年  
時  
人  
只  
思  
一  
夜



# 生 回 憶 錄

让老人说话 让青年行动

# 張永儒革命人生回憶錄

——“老人 老话 老地方”

一耽学堂拜老系列之一

一耽学堂 整理

江 海 编辑

丙戌[2006] 仲冬

## 前 言

“文化是生活态度，是活着的人和活着的人所做的事。”我们当前的文化建设，很重要的努力是要在行进当中看见“人”，互相看见，彼此呼应。

老人，是我们社会道德和人生智慧的高端，他们饱经风霜，历尽坎坷，把生命的光亮燃到了生活的每一个地方，他们站在风霜里，看着一代代的生命把时间锻成为历史，把血肉铸成为丰碑，他们承续了有血肉的久远的过去，也开启了有希望的年轻的未来，他们身上有着默默地努力日新的信心，也有着绵绵地平常生活的力量。老人，以归真的朴纯心地，站在生命的制高点上，本色的看着我们。

学习，是为着成就生命；生命本身，也随时地为着托起生命、养育生命。学堂从2001年开始，即开展有“亲近师长”的活动，随着文化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我们希望在更深的时代背景、更大的社会范围下，通过拜老等系列活动，逐步落实“生命高端战略”，努力推进文化建设事业的持续深入。

我们愿意向所有有志于学的朋友发出殷切的呼吁，希望大家积极响应和行动，通过拜访、亲近老人，倾听他们丰富的人生经历，释放他们醇厚的人生智慧，促进我们自身的学习成长，促成更广泛、更充分的共识和行动，为弘扬文化精神，传承人生智慧，改良社会风气，规正道德人心，促进社会公正，构建和谐社会贡献积极的力量。

“让老人说话，让青年行动。”

## 目 录

自撰简历·····	1
1、家庭出身	
2、童工生活	
3、为了生活，出卖苦力	
4、革命生涯	
艰苦的抗战岁月·····	5
塔崖驿战斗·····	10
运粮遇袭·····	12
山洞避敌记·····	17
虎口脱生：记盘神庙战斗·····	20
一发山炮弹·····	23
孤身俘敌记·····	26
怀念八路军的妈妈·····	30
一支不寻常的毛笔·····	33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36
【附】一耽学堂拜老专访：“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听张永儒老先生谈生命历程·····	46

## 自 撰 简 历

### 一、家庭出身

我叫张永儒，1923年12月出生于河北省满城县的一个贫农家庭。因家贫穷我的父亲祖父都没上过学，所以全家人都只靠家中仅有的几亩山地薄田来维持那糠菜半年粮也不足的生活。老人们为了多收几粒粮食，每日起早贪黑就在这几亩黄土地里“面朝黄土背朝天、汗珠落地摔八瓣”的辛勤耕耘。我的祖母就因为没饭吃被饿死；我父亲也因劳累过度四十多岁就英年早逝；我弟弟参加抗日，在执行任务时被打瞎双眼；我大叔参加八路军在参加歼灭日寇阿部规秀中将所部的黄土岭战斗中牺牲；我三叔被日本飞机炸死。

我年到八岁，父母亲把扭转家庭因祖辈无人读书始终处于贫困处境的希望寄托在我这一代人身上。老人们宁愿自己忍饥受饿也要决心供我去读书。我入学之后，老师也深知我家的处境和老人们的心愿，就给我取了个学名叫张永儒。儒者，读书人，是要我很好地读书成为一个有学问、尤其要懂得孔孟所教仁、义、道、德、忠、孝、悌、礼的人。可惜我当时对我长辈和老师的苦心并未十分重视，由于当时老师在施教中对学生的那种极端严厉的教学方式给我心灵中造成严重的压力，所以我非常不愿去学习。但又不敢违背父母之命，就这样硬着头皮勉强上了四年学，可后来才觉悟到这四年学对我一生的命运起的作用是多么重大！我读到四年时，家中又增加了一个弟弟、三个妹妹，家中生活更加艰难了，父母只好叫我辍学，帮老人下地种田。可是靠天收成的那几亩薄田产量没法提高，父母无奈就把我送到保定，托人介绍到一家印刷作坊里当学徒（童工），这时我还是个十三岁的孩子。

### 二、童工生活

我十三岁到保定西街青林阁印刷厂（作坊）学徒。作坊老板是蒲振声、蒲振华兄弟俩，他们祖籍是河北省新城县方家务（村）人。这老板对待工人非常残暴。我去后就把我当牛马使用。他规定早晨不能等其他人起床我必须先起床。起床后先把他们的尿壶倒掉、洗净，然后打扫工作间，完后去厨房生火做饭。我在家都是吃现成的，那里会做饭？开始由师兄带我，几日后做饭的重任，一日三餐就都落在我的身上。每天吃的基本上是小米、玉米混合的杂合面、窝窝头和稀饭。当我把饭做好后先要给老板盛上，最后我才

能去吃，并要求我一定要比大家先吃完，饭后把锅碗洗净后就马上到工作间去印刷。每天工作都不低于 16 小时，如遇活儿多忙、时就要 48 小时不停地连轴转。下面我介绍点劳累的实例：

1、 饭做的不好必受打骂。

大概我去后半年左右，不知怎么那天老板发起慈悲，要叫大家吃顿大米饭。我长这么大不要说做大米饭，别人怎么把大米做熟的我连见也没见过。我又不敢说我不会做，只好盲目下手。当我把水烧开后，把水倒入锅中，努力拉风匣催火，我见水一翻滚就立刻把铲子伸进锅中进行翻动，谁知这样一翻就糟了，米在锅中软一层脱落一层，不一会儿米还未熟就成了一锅粥。我取几粒米一尝，米中心还是硬的，可这时锅中的糊味已冲满房间，我马上停火……开饭时间到了，大家都来吃饭，可怜米一进口就有人喊起来：这饭是怎么做的呀！叫人怎么吃？！这时老板的眼珠子瞪得比牛眼还大，他把碗在桌上一摔，站起来不由分说，口中骂道：你他妈的这个笨蛋！我叫大家吃顿米饭，你就给我做成这样！同时举起手向我头上打来，顿时我眼冒金花一阵晕眩几乎倒地。我不敢哭，只能忍气吞声暗自落泪，心中在想，这要叫我奶奶和妈妈知道了，她们不知要多么难过啊！

2、 工作太累，晒死人。

因为每天超时劳动，莫说一个孩童，任何人也受不了，牛马还需卧地打个盹呢！正因此我立着工作时就晒得睡着了，被老板发现，他不吭声，走到我的背后，伸出他那无情的巨掌，向我脑后打来，我的头猛向前一栽被撞在架子上，上嘴唇被撞开一个洞，血流满地。我只好捡起一块破纸堵在破洞上，眼泪和血混在一起……至今我上嘴唇还留着这苦难的伤疤。

有时，我晒得实在受不了了，只好假装去厕所解大便。每当我蹲在便坑上就睡着了。这次可能是我在便坑上蹲的时间稍长了点儿，老板见我不回去，就出来找我。当他发现我是蹲在便坑上睡觉，他先是狼一样大嚎一声，把我惊醒。我赶忙起身提裤，这时他那狠心的手已打在了我的头上……

睡觉时我从工作案上摔在地上竟无摔醒。一个人晒到极点是什么滋味？我睡的床铺就是我白天的工作台，每次只要躺下用不了三分钟，保证睡熟。工作案的木缝里常有数不清的臭虫，只要我躺下，那成百上千的臭虫就迅速爬到我身上开吃。尽管这样，我也不会被咬醒。我的被里面到处是血，就是它们吃饱后被我翻

身压烂的。有次，我一翻身，连被和我一下子从案子上掉在了地上，可竟没被摔醒。天将亮，老板喊叫起床，我才知道我还睡在地上呢！……

就这样，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好不容易三年期满出徒了。卢沟桥上炮声隆，可恶的日本鬼子来了。老板辞我让我回家。三年中除了每天吃他三顿杂合面窝窝头外，其他衣服、被子等用品都是我父母给的。到底三年我给老板创下了多少财富，只有天知道。我临走时蒲振声给了我一元五角钱的河北省纸币，就算我三年的工资，实际上连回家路费也不够，这一元五角钱在当时只能买15斤玉米面。

一九六八年，我带儿子回家探亲，带他到了我学徒的住址，向他们介绍了我当年在那里所受的苦难。相信他们不会忘记的。

### 三、为了生活，出卖苦力

我从保定回到家中，日寇侵占了华北，家中生活更难度日。只好又辞别父老外出自己挣口饭吃。首先我到了保定南关火车站，托人介绍当了工人，出卖苦力。工作是从火车上向下卸煤，然后再把煤用筐抬到百米以外的煤堆上。我和工友们就这样的倒煤。二百多斤重的煤筐两个人抬着走上十几米高的煤堆。上去时要经过三道（块）木跳板，每块七八米长，第一块的一头搭在一个高木蹬上，第二块再搭在比第一块高几尺的木蹬上，第三块再从第二个木蹬上搭上煤堆顶上，工人就沿着木板向上抬。每天要抬多少筐难以计算，每天的工资只能买几个杂合面窝窝头，没有菜吃。我只能每星期买半斤辣椒酱，装在酱篓里用筷子蘸着当菜吃。因为每天生活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煤炭环境中，爆起的煤灰时刻都包围着我们，吸入鼻孔里、肺里。每当有痰吐出时就是一个湿煤球，全身除眼的白眼珠是白色外全身就像一个煤做的人。

为了吃饱饭，白日工作后到了晚上还要约几个工友到下闸河边去找活干。大部分是从船上向岸上卸煤等物资，每卸一船货每人又可分得几分钱，用来补充白日的不足。

数月之后我又和工友们到北京门头沟城子矿，这里和保定的工作相反，是由工人们一筐一筐地把煤从地上抬上火车装入车皮，抬的方法也是经过三级跳板。一个火车皮要装二、三十吨煤，需要我们抬多少筐才能把车皮装满啊！

就这样，因成年累月地负重劳动，我的右肩膀已经被压的严重变形，只要脱下上衣你就可以看到我的右肩比左肩要低一两寸。这就是我一生苦难留下的铁证一部分。

#### 四、革命生涯：

- 1940年3月参加八路军，走向革命路。
- 1940年3月参加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一分区特务营当战士
- 1941年春到抗大二分校第三期学习
- 1941年秋—1944年在一分区一团（狼牙山五壮士团）当班长
- 1945年到延安延属分区教导第二旅警卫营任文书（参加南泥湾大生产）
- 1946年延属分区教导二旅警卫营任书记
- 1947—1949年西北第一野战军16师任参谋
- 1950—1953年北京军委装甲兵干部部任秘书、秘书科长
- 1955—1958年南京军事学院装甲兵系学习（本科）
- 1959—1964年军委装甲兵第二坦校任副大队长，处长及战术教研室主任
- 1964—1979年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为航空部）第六研究所、室里任书记
- 1979年 离休至今

1940年至1949年是在枪林弹雨、浴血奋战的艰苦生活中度过的，在抗日战争中曾参加百团大战及数次抗击日寇的扫荡，在解放战争中参加了保卫延安、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荔北、宜川瓦子街、西府、解放西安、解放兰州等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有记载的就八十三次之多，仅1948年在陕西梁周村歼灭胡宗南36师的一次战斗中，我独身一人击伤、击毙和生俘敌人40余人及战马六匹。我作为一个国家军人，我忠实地尽了我应尽的义务，我全家人为中国人民解放的解放事业付出了重大的牺牲。

---

本文3200字。



## 艰苦的抗战岁月

——摘自 2005.04.09 在一耽学堂作“我的生命历程”座谈录音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我们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就起来，开始抗战，我们就在这样的局势下，参加了八路军，跟日本人进行斗争。中国和日本帝国的斗争，是很苦很苦的，当时我们中国啊，很难哪，你看有什么呢？大家知道，当时，汪精卫是蒋介石的一个副帅，他有几十万军队，日本打进来以后，他就投降了日本，跟日本人一起，就打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就打我们。那些地主、买办，都变成了汉奸，中国那时候……老百姓，因为日本势力很大，打进来以后呢，老百姓的悲观情绪非常厉害，总认为日本要成为中国的帝王，连蒋介石都认为中国打不赢……悲观情绪很重。所以只有中国共产党，打起抗战的旗帜，领导全国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咱们有多少人呢？从长征到陕北，只有三万多人——一共三十万人，打到陕北剩了三万五千人，就这么多的……真正军队剩的，已经无几了，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那三万多人的军队，深入到了华北，成立了晋察冀军区、晋鲁豫军区、晋绥军区等，成立几个根据地，散布开来，这样打。这个面积，该有多少人？抗战，这就是抗战的主力。他们发动边区的人民起来斗争，那时我们这些人就是在那个情况下，参加部队的。

当时咱们的力量是很小的，咱们没有工业，好的地方都叫日本给占了，平的地方，铁路线、沿线，都叫日本给统治了，我们晋察冀边区啊，晋鲁豫边区啊，都是一些山区、大山区，山区里头人员少，产量是很少的，好地方都叫敌人占据了。敌人把好的地方控制以后，成立了他一套伪政权，建立了一套统治机构，在我们边区的边沿上，他修建了碉堡，挖壕沟，建封锁墙、封锁沟，把这个边区围起来了，所以那时候，边区人民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养这么一支军队，慢慢扩大起来，和日本人斗争。没有工业，当时自己没有生产能力。当时我就参加（八路军），就编到了晋察冀的第一分区第一团。这个团是当时晋察冀边区一个主力团，这个主力团，它所控制的这个面积也就是这么五百左右平方公里，易县哪、涞源哪、涞水啊、徐水啊、满城啊，还有尉县、完县、定县等等，就控制这么几个县。

参军以后，因为我以前上了几年学，认识几个字，编到班里以后，就当了一个学习小组长，就干这个。那时候我们没有多少枪，我去了以后对我还比较优待的，给了我一个德国老套筒，我感觉好得很……还有这个枪，给了两个手榴弹，其他的好多人就是大刀片，拿着个大刀……一个人带着四个手榴弹，一支枪，带着三发五发子弹，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些枪怎么来的？八路军就是靠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还有地

主、老财——也雇护院兵，（利益）也叫日本人占了，有些个也待不住了，把枪交出来，给八路军打仗去，大部分都是捐上来的那些枪，我们自己没有别的来源。蒋介石说是供给八路军三个师，实际上他根本不给一发子弹一个枪，根本不给。这枪后来怎么来啊，就是……我们有个歌子叫“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是不是？“没有吃没有穿，自有敌人送上前”，就是从敌人手上去夺，随后八路军的扩大、壮大都是从日本人手里夺过来的。今天打掉这么几个人，得一条枪，明天得一个子弹，就是这么壮大，慢慢一点点地建起这个家来。所以八路军还是很穷的，仍然很穷。当时我们穿的衣服，没有（统一的军装），穿什么样的衣服都有，老百姓的，蓝的也有，黄的也有，都是老百姓织的一些土布。找些国槐花，染一染，染成黄色的，老百姓给做成衣服穿。再就穿那衣服没有咱们现在穿的这个制服，兵工厂的，麻布的；要有的话就是把日本兵消灭了以后，从日本兵身上得来的：得来衣服，得来毯子。就是从这儿得的这些东西，其他的没什么来源，都是靠老百姓供应。当时鞋子，老百姓给做一双鞋。我们那时候，一个月给一块钱的边区票（纸币）——这是后来的，开始还没有——一块钱的边区票子，还要拿出八毛钱，给做鞋的这个老百姓，剩下两毛钱，会抽烟的，买点烟、买点旱烟抽；不会抽烟的，像我这从来到现在也不会抽烟，那两毛钱干什么呀？买点咸盐，弄一个小布袋子，装起来，有时候吃饭时没菜吃了，就用筷子把咸盐蘸一下，就是蘸着吃。所以没有真正可以……

有一次，也就是狼牙山五壮士跳崖的那一年，日本人在扫荡。日本人进来以后，我穿的那个鞋啊，已是穿了很长时间了，又下雨，所以鞋就开绽，不能穿了，只有光着脚，日本人在追，我没穿鞋，赤着脚就在山路上走十多里路……最后走得实在不行了，有一个同志，他背包里还保存着一双鞋，他自己穿的鞋都破了，最后实在是不行了，他才把背包里的鞋拿来给我穿，这就是当时穿这个鞋、穿一双鞋子很难呢！

我们吃的饭，当时的生活要求是规定三钱油三钱盐十一两半（十六两进制，相当于市斤秤七两半）小米，每天就是这么大的量，但是这个数也是保证不了的，根本保证不了的，就像我们六零年，大家都知道1960年有一段（困难时期），说是给你发个票，一个人二两肉，实际上2两肉是买不着的。跟当时那个情况有相似，规定几钱油几钱盐，是吃不上。每天吃饭，常是吃这顿饭，刚撂下饭碗，还要想着下一顿饭。为什么呢？因为肚子还在饿着哩。我可以告诉大家，那时候，在这个整个的一年当中，吃一顿饱饭的时候啊，几乎是没的。

我们最喜欢的是什么呢？放哨！开饭时愿意站岗去，大家开饭了，我去站岗。为什么要站岗呢？就是站岗回来，那个饭就不打在班里去，由伙房给留下来，留下来，可

能留得稍多一点点。另外做饭以后那个锅，里头有那个大锅巴，可以留下一块锅巴，给这站岗的人吃，站岗的人沾这个光。除此以外战士整天就是挨着饿，饿着肚子在外边战斗。我当班长就更难了，吃那个饭怎么吃法呢？等开饭了，一吹哨子，吃饭了，我们借个盆子去打饭，一个盆子打饭一个盆子打菜。两个人去打饭打菜，去了以后，炊事员把那个饭，12个班，每个班一排子饭就给你分好了，就给你打好了。打好了端回班来，班长就开始下命令了——班长不说话，谁也不能动手的。班长说你们盛着吃吧，这时候战士们才开始下手，在盆子里盛到自己碗里。盛的时候谁也不敢用筷子压一下，都是轻轻的拨到自己碗里，盛那么多半碗，就不敢往上添了，都互相谦让。等大家盛完了，我这班长下命令了，大家吃吧，大家开始吃了，我这时候才自己盛自己的，等自己盛完了，大家就三口两口的吃下去了，一个人盛那么两半碗之后那饭就光了，战士们看着班长还没有哩，就给盆子里留一点，自己拨到自己碗里再吃。就是这个状态，吃这个饭的情况就是这样的。那菜更不用说了，有时候吃萝卜菜，切的很细的条，大部分是汤，一个人捞这么几根萝卜条吃，就不错哩。整天饿着肚子吃什么呢？吃树叶，所以我现在可以这样说吧，野外的树叶，榆树叶子杨树叶子柳树叶子，没有树叶没吃过的，连那个山楂、山里红叶子都吃过，吃遍了，都吃遍了！冬天没树叶吃吃什么？从河里去捞榨草吃去。河里的榨草好吃吗？这个能吃吗？不吃那肚子是饿的，就用这个给肚子充饥，就是这样子的。

老百姓就更苦了，边区人们本来就生产不了多少粮食，再加上还得养着军队啊，军队得吃啊。军队打仗，十一两半就得吃啊，给军队吃，所以老百姓啊，饿死的不少，这个咱们就没法说去了，我的奶奶就是饿死的。我的奶奶才五十几岁，就饿死了，所以那时候吃东西啊，老百姓啊，苦啊，我记得是我们在崎峰庄住，我们吃完了饭，那木桶里头那个稀粥都捞得很干净啊。有个老百姓看那桶里面还有几个饭米粒，就要到桶里抠那几个饭米粒送到嘴里吃去，你看当时那个吃饭是多么的苦多么难呐！有时候我们在敌占区打仗，靠敌人控制区和我们交界的地方，去了以后怎么办哩？有次就是我带一个班出去活动，等到中午要吃饭了就找这个村长了。人一来就知道是吃饭来了，村长就把一个班分到各个家里去，你这个家里去两个，那个家里去一个，那个家里去两个，就这么分一分，去了老百姓给做什么呢？老百姓哪有粮食，哪有这么多粮食？没有这么多粮食，给做一点稀粥。一盆稀粥，战士们看着老百姓吃，老百姓看着我们吃，吃完了以后，给老百姓打一个白条。写上：兹有某团某连张永儒等三人在某某家吃饭一顿。有次村长给派饭，当到一家后，那个老大娘出来说：“村长啊，你进来看看我家连一粒米也没有了。”村长没办法，只好派到另外一家去。到现在那个八路军纪念馆可以看到有当时军队打的

白条，老百姓保存起来现在还有。吃饭就是这样子的。

吃的穿的用的，那时候军队在这个边区的生活很苦很苦的，有的时候，有一次在隆化县木场村，早晨起来刚做出饭要吃了，敌人来了，战斗马上打响了，这一顿饭你就别想吃了，没了，你就饿着肚子，就是这样。所以老百姓饿死的人啊还是不计其数的。据说日本当时杀害中国人三千六百万，牺牲了三千六百万，这个数字我不相信的。在我所知道的好多死了的战士，他的家至今都不知道的就有好几个，更何况全国那么多的军队，死的人有多少？老百姓饿死的有多少？有的战士打仗，参军进来以后，早上参加的晚上就牺牲了，有的名字还不知道，从哪里知道是死了三千六百万？对不对？到现在好多家属连得个光荣军属荣誉都没有，为什么？我到北京以后把所知道的战士们是怎么牺牲的，我都给他们写出来，你的弟弟你的哥哥什么什么和你的孩子牺牲在什么地方，我都给他们写出来发出去送到他们家里了，但是我知道的不多，到现在还有没通知到的，家里根本没人了。我们班有一个战士叫王福的，（保卫延安时）就牺牲在敌后，牺牲了，牺牲了以后，我通知到他家里，在崎峰庄，他家没人，通知不了。所以在全国统计数字里面，我觉得那个数字是不太确切的，不一定是那个数字。

当时没有医院，（没有）药，所以伤兵打伤了以后怎么办呢？负了伤基本是食盐水，就是吃的咸盐泡成水，用那个食盐水去擦伤口。最好的药品就是、就是什么呢？碘酒了！碘酒是我们使用的药里头最高级的。现在什么消炎药，这个药那个药，那时候从哪看见？名字都不知道。有一个战士被这么大的一块炮弹片打在大腿那边去了，那血往下流，流满了全身，我看到脸上都没血色了，最后那个战士在那喊“班长你救救我、救救我！”……我不敢想象这个，我不敢想象这个事……和我一块参军的一个冯永生同志，在打紫荆关的时候，一个手榴弹片给打在了大腿里边。他里面穿棉衣，那炮弹片打进去把棉花给带进肉里去了，又不能开刀动手术，没办法啊，没药品，没办法弄它，就那么养着啊、养着啊，最后养着里面烂，烂着往外流着浓，流浓水血水以后，好啊，冲出来一块棉花丝，棉花丝这么一拽、拽、拽，唉，因为那肉已经烂了，窟窿已经大了，他把那个炮弹皮连着棉花一拽，拽出来了，后来外面养的伤口才好，要不然炮弹皮在里面的话，那就没法好了。现在我们知道了得破伤风的，那时候谁知道！？所以为什么好多战士没法治，伤了以后基本上那就是没法治，要像现在这样死人可以少了，那时候为什么战士牺牲那么多？打伤了以后那基本就是、重伤好的很少，基本就牺牲了。

我们出征、出发打仗去了，战士都这样想的，把好的衣服都自己换上来，有好的鞋子穿在脚上，把烂的鞋子背起来，为什么呢，就是准备死了以后呢自己穿的一套衣服死，这就是自己出征都要做这个准备，随时准备牺牲了，就这样。有一次我就上了当了，

我就穿了双新鞋，打紫荆关，走四五十里，下了雪，下了那么厚的雪，那个新鞋鞋底子是用麻绳纳的，所以鞋底很硬，走起路来和雪粘一块，越来越厚，越来越厚，最后这个鞋后跟粘的像女同志现在穿的高跟鞋一样，走不了，到石头上吭吭几下子把那个踢掉，踢掉又走，又走一会又粘着不走了，所以那次穿新鞋上当了。要是不下雪可能还没这个事。

再说吃的东西。上面刚才也说到一个事情，就是东北，东北那个杨靖宇将军，最后牺牲了，日本鬼子把他杀了，杀了以后从他肚子里头，破开肚子看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八路军还能活着，从他肚子里剖出的是什么？草根子！净是草，没粮食，所以，实际上一个司令员就这样子，跟战士们同甘苦同患难，就是这么过来的。

---

本文 4700 字。

## 塔崖驿战斗

——摘自《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2005.08.08）

我 1940 年参军时不满十八岁，一到连队里，刚到班中，连长、指导员看我身材较好，又上过四年小学，所以对我很器重，入班后就叫我担任学习组长，在班里一半人没有枪，每人只有一把大刀和几个手榴弹的情况下，发给了我一支德国造的老套筒枪，并带有五发子弹。我说不上如何高兴了，对枪弹爱如珍宝。为了掌握杀敌本领，我勤学苦练，在一次战斗中，我用这支枪打死了一个日本鬼子。当时的战斗是我们一个连去袭击塔崖驿敌人碉堡。经侦察得知鬼子在塔崖驿北山上正修建一个碉堡，碉堡已修了一半，有一个班的鬼子兵已经住进去。团里考虑如果再等几天，他碉堡修建完工，再去打，那困难就太多了。所以决定早点下手消灭他。连里决定叫我们排担任主攻。我们头天下午从几十里外的驻地出发，半夜时已到达了敌人山下。我们全排战士轻手轻脚地慢慢向山上摸去，不敢有丝毫响声。当我们摸到离碉堡还有五六十米处时就透过朦胧月色的夜空隐约看到上面有一面旗子在随风摇动。这时旗下有一条狗突然汪汪地狂叫起来，随即哨兵随着狗的叫声叭、叭开了两枪。这时我们知道敌人已经发觉了，要尽快前进，所以我们什么也不顾了，拼命地冲了上去！手榴弹投向了敌堡，发出了巨大的爆炸声，刹时间就和敌人拼到了一起。二班长冲在我右前一点，两个鬼子直向他刺了过来，非常危险和紧急。我本能地举枪对着一个鬼子的胸部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这鬼子哼了一声，倒了下去，另一个鬼子也被二班长打倒。只用了几分钟，我们就结束了战斗。有的战士去拿敌人的呢毯，有的同志在脱敌人的衣服，我突然发现在碉堡西面几米处有几个元宝形的饭盒子，提了起来，其中有一个有重量，打开一摸里面有剩饭，我不顾这饭是否变质，伸进手就挖着把饭三两口就吞进了肚子里。

---

本文 730 字。

**注：关于以上故事，另参考：**

**2005.04.09 在一耽学堂作“我的生命历程”座谈相关叙述**

有一次打那个塔崖驿，塔崖驿是靠近易县紫荆关上边现在可能是火车站。敌人在那上面筑了个碉堡，那个碉堡垒了一半，还没垒起来，垒起来就麻烦了。老百姓给我们通气，说敌人在那个北山上筑碉堡，筑了一半了。所以那天晚上我们连就准备袭击了，就

打他去了。我们排担任主攻任务，从我们驻地到塔崖驿四五十里，正午就向塔崖驿进发，天黑我们就顺着山沟往上摸。不敢闹动静，一点动静都不敢出啊。爬啊爬啊，爬到离山顶还有一百多米了，我看见山顶上有一个旗子，一个日本旗子在晃动。从天空当中看到了，还有一百多米。这时候敌人一只狗在上面“汪汪”的叫了起来。狗听见我们的声音了，狗一叫他们两个哨兵“啪”“啪”往下打了两枪，我们的部队以为被敌人发现了。我们就不顾了一起往上冲，赶快冲，冲过去了以后战士拿手榴弹“乒乒”就打。手榴弹就甩到敌人那个碉堡里面去了。那个碉堡没顶，敌人没盖上顶子，就垒了一个壳。我们的手榴弹一响就上去了，就冲上去了。我们冲上去后，这时我和四班长冲在最前，有两个鬼子向我们这边冲过来，我向其中的一个鬼子扣动了扳机，呼一枪把他打翻。另一个鬼子被四班长干掉。就冲入敌人的碉堡里边。冲上去了跟敌人就刺刀见红了。很快就将敌人一个班的兵力给吃掉了。吃掉以后，有一个老日本鬼子，他已经伤了。四班长上去用刺刀刺他。他一把抓住四班长的枪，他又拿枪来刺四班长。我在后头一看，我上去就给了他一枪，所以在这次斗争当中很紧张（是入伍后第一次用枪打死日本鬼子）。打完了以后，我看见旁边放了一些铝饭盒子，我一踢里面很重。那就是他们吃饭时没吃完，剩的。我就提起来一个，打开盖以后看见里面有饭，一闻，也不管什么东西了，我就用手大把大把的挖着往嘴里吃，把那些剩下的饭给吃掉了，也不管馊不馊了，因为饿呀。这是打塔崖驿。

---

本文 750 字。

## 运粮遇袭

——摘自《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2005.08.08）

百团大战前夕，晋察冀一分区已被敌人蚕食得只剩下一片山区。再加上敌人常扫荡，使我们边区军民吃饭更是雪上加霜。为生活下去，分区领导决定命令我们这个营专门去到铁路（平汉线）以东去筹措粮食。我们到达了河北荣城、新城、杨村等地，三个连分别完成了以下任务：一个连分散去筹备粮食，一个连去集合民工（每次500人左右）一个连掩护民工担上粮食。从路东运到路西徐水县打磨山村。这里有人接应再运往边区内地。这样三个连轮流担任一项任务，担任掩护民工的连是更辛苦。因每天往返带领担粮民工要来回穿过铁路的敌人封锁线，还要走七八十里的路。这样我们运了一个多月后时间到了1940年八月十四（阴历）。接到分区命令，停止运粮任务，立即返回根据地参加百团大战。可谁料这时有汉奸、敌特得到了我们的情报，密报给了鬼子。敌人立刻集中了三个县的兵力。于阴历八月十四的夜晚布置在户木、遂城附近，在我每次必经之路的丁庄布下了埋伏。敌人的阴谋行动，我们并未发觉。当我们正通铁路时出现了新的情况。一个月前已被我们锯倒的路边六根电线杆、敌人为了通讯联络，偷偷的用皮电线代替了原来的铁线。从北边的电线杆上接上。然后挖了沟把线埋在地下。正在通过铁路时被派出的哨兵发现。哨兵立刻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营长马辉。马营长得知后喜出望外，命令一二连先走留下我们三连。并指示说：“敌人埋的皮线实在是好东西，边区正缺这宝贝。你们连把这皮线全部给他弄走。”这时一二连先走了，在敌人尚未布好埋伏前通过了敌人未布好的埋伏圈。我们三连在营长带领下，七手八脚的收敌人的皮电线。时间花了近一小时，我们背上电线继续向目的地前进。这时天将拂晓，战士们因完成运粮任务，又意外收获了许多敌人的电线，凯旋而归非常高兴。所以有的同志竟唱起了战歌。指导员吕宝基听到有人在唱。他知道这个地点正处在北面距户木敌据点只有一千多米，南面也离遂城不远的敌占区，一旦被敌人发觉就非常危险的。所以他就制止道：“别唱别唱，这里离敌人很近！”歌声停了，说着我们进入了丁庄村，可当我们刚一进村，敌人已布好的机枪突然向我们扫射起来。连长叫大家出村东口向南突围，谁料刚沿路向南走出不到二三百米，敌人三挺机枪正堵在路上又突然向我们扫射过来。敌机枪离我们只有四五十米，加上敌人步枪的乱射，这真是处在弹雨之中。我们没有什么反击的准备，在这平原地里遭此突袭，顷刻间路上被敌人打倒了十几个战友。其中包括长征过来的连长于明



建和侦察排长。我们被敌人打散了，大家纷纷进入两侧的玉米地高粱地。我们班就向东南方向突围。只见营长的乘马和他的警卫员都被敌人击中倒下了。我们只好向东突，认为这个方向最安全。我们跑出大约五里左右，突然出现了一个三、五户人家的村庄，我进院一问，见是一位五十左右的大娘，一听她口音是山东人，就向她说明我们刚才的遭遇，并请她给我们做点饭吃。大娘对我们很同情，叫我们在院子里坐等，她进屋不多时给我们做了一盆粘米饭。我虽然也很饿，但因遭敌伏击，怒火好似在烧我的胸膛，根本吃不下。我叫大家吃，我怕敌人追来又遭不测，我就爬上平房顶上，拿了一个筐子，就趴在筐后去监视观察情况。我不断地向四周观望，忽然发现北面三四百米处有一个穿黄衣的人向我们运动。我没告诉吃饭的战士们，只把子弹推入了弹膛要看清楚些。如果敌人来得多，我们就走开。如果就几个人，就打他个伏击歼灭他。我监视着他往前走不见有多的人出现。当这人走到离我二百米左右时，我喜出望外，看清这人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营长马辉。我向他报告我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营长替我们付了饭费。然后带着我们返回遭受敌伏击的地点。我们走到那里一看，十二个战友的尸体上都被敌人又扎十几刺刀，鲜血染红了一大段土路。我又向南走去想看清敌人的机枪是在哪里发射的，我走了大约 50 米看到地上有三堆弹壳。敌人每挺机枪间距只有两三米，我们向丁庄村老百姓找了一辆大马车，把战友的尸体运回打磨山。连里的干部战士见到此惨景无不挥泪痛哭。

同志们，看，只是为了解决边区军民的吃饭的事，就有十几位战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包括我们的连长于明建这位两万五千里长征都闯过来的江西老战友。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却永远的沉睡在了河北徐水县打磨山。

---

本文 1730 字。

**注：关于以上故事，另参考：**

**一则：2005.04.09 在一耽学堂作“我的生命历程”座谈录音有关讲述**

1940 年的时候，边区人民没吃的。杨成武是司令员，就把我们这个营的部队派出来，到铁路东去运粮，解决边区人民没吃的问题。我们三个连轮流住在路东的杨村那个地方，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村的桑造死的地方。三个连轮流着，今天这个连带领一千多民工担着麦子从路东运到路西来，撂在路西的一个村子里，那个村子叫打磨山。村里老百姓就把麦子运到边区去了，我们这个连当天还要返回路东去。第二天，那个连又带着

（民工）向西了，三个连这么轮流着循环。我们运了三个月的粮食。等运到 1940 年阴历八月十四的晚上、十五的早晨，接到命令了，不运了，要回到路西去了。我们就准备回来了，路上铁路上的电线杆已经被我们破坏了。把电线弄断了，鬼子通不了话。他们又把电线用胶线接下来，把地下挖了一尺深的沟拉出好几百米，从铁路那边电线杆子上又拉上去。平时我们来回（运粮食）不知道，可是那次我们回去的时候一过这个铁路有战士，哨兵作掩护就发现了。给营长报告，营长是马辉，后来河北军区的司令员。报告说：“营长，营长，敌人把电线埋在土里去了。”营长想有电线，说：“给他拉，拽出来！”拉出来以后，用刺刀给他砍断，砍断后一人背着几十斤电线往前走。其它的连已经走了，就剩我们一个连了——为了运电线。从铁路背着电线运，走到一个村——荆庄。当时我们背的东西很沉，背的又是咸盐——一个人七八斤咸盐又有电线。由于电线很重，后来有人说：“从老百姓家里找个车吧，让战士们轻松一点。”于是就找了个马车，从老百姓家里要辆大马车，把电线放在马车上继续往前走，往西走。走了一会儿快天亮了，战士都很高兴，因为快到边区了大家很高兴。有个战士很高兴就唱起了歌，这时候还是吕宝基教导员说：“别唱了，这一带离敌人很近。左边是（易县）户木村，右边是遂城村。敌人离这里只有几里路。（小心）让敌人听见了。别唱了。”结果刚出村西，看见敌人三挺机枪在那里堵着，集中了附近好几个县的敌人在那等着，在那埋伏着了。我们一出村机枪就响了，我们这个连队就赶快从村里出来就向南跑。可是，往南走，走出去了没半里路那个地里又有三挺机枪在那个玉米地里等着呢。等到我们走到那里，机枪“哗哗哗”的就响了。这一响可不得了，我们的连长于明建同志还有个侦察班长等十几个人都倒下了。我一听到枪响，我一下就扑到玉米地里趴下了。等枪不响了，我就带着班赶快跑，跑出来以后怎么办呢？三面都是敌人往哪跑呢？不能往西走，西边南边已经是敌人了，只有往东跑。奔铁路走，往回走安全。我带领我这个班就往铁路边上跑。跑到离铁路还有三里多路的时候，路边有个小村，叫什么村我忘了，反正大概有三五户人家吧。我们就进去了。进去以后（见到）一个老百姓，山东人，一个老大娘，我就说：“老大娘，我们还没吃饭，给做点饭吃吧。”老大娘说：“可以啊。”就作了一盆粘米饭。可是我的心里头，因为当时被伏击都很窝火。我就说：“你们吃吧，我不吃。我去放哨去。”我就爬到房顶上去放哨去，当时是平原也没有高地，四处都是玉米高粱。我就爬在房顶上观看，这一看，看到一个穿军装的，我心说坏了，日本鬼子又来了。我就把枪顶上子弹等着他，我看有多少，要是人多的话准备带领我们班的战士跑啊，如果人少的话再说嘛。

我在房上就看见他一个人，走得近了我一看越近越像，结果是我们的营长马辉同志。他一个人，警卫员也牺牲了马也被打死了。他一个人逃出来了。见到我们以后，吃了点饭就回去收拾那些战士的尸体去吧。回去一看十二个，有于明建连长还有班长。被敌人的刺刀每个人身上都刺了十几刺刀，（那是）被敌人子弹打倒了以后都走不了了，被敌人用刺刀（刺死）。我们就用一辆大车把战士们的尸体运走。这是为了吃饭，吃粮食从东往西运。本来三个月已经完成任务了，结果还是有同志牺牲了。于明建连长是长征走过来的，老家江西的。结果为了运粮食被敌人打死在这里了。

---

本文 1570 字。

## **二则： 1987 年 1 月 26 日《致原河北军区司令员马辉老首长的信》（摘录有关此次战斗的回忆）**

事情发生在抗日战争时。你能记得 1940 年阴历八月十五日早晨发生过一件至今使人心酸的事吗？你当时任一分区特务营营长，我在你营三连二班当班长。我们从该年阳历的七月开始奉命到铁路以东向路西运粮，常走的路线是西至徐水打磨山经固城以南 6 公里处过铁路到路东第一个村子野营桥，以后再去杨村一带收集小麦。咱们营三个连每天以一个连轮流掩护着 500-1000 民夫把麦子运到一分区去。一直运了很长时间，时至一九四〇年的阴历八月十四日为止，才奉杨成武司令员的命令调回分区根据地去。回去的目的是要参加百团大战的。就是这天晚上，我们从路东出发经过铁路时发现了敌人在我们破坏了的电杆上重新架起的电话皮线，是埋在地下的。我们三连当时担任掩护全营过路，你就下我们连收敌人的电线。等收完后已是十五日的凌晨两点多了。当我们通过丁庄在早晨四点左右到达屯里时，正是黎明之前，突然遇到敌人的三面伏击，当时伤亡很重。我们的连长于明建同志和侦察班长以及我连战士十个人当场被打倒在村东南角的庄稼地边的路上。你的骑马和警卫员被打死在村东的地里。你一个人独身向东跑了，当时身边一个兵也没有。我无被打倒，我带着二班战士也向东跑了。当我们跑到离铁路只有五里路的一个独立家屋时，我请求一个山东籍的房东老大娘给我班做点饭吃，大娘给我们做的粘小米枣子饭。我因为部队遭受了损失，心里一肚子火，根本吃不下去。我就爬上房顶替战士放哨，叫他们吃。正在观察中，我从远处的地里发现有穿黄衣的人向我们走。当时我以为是日本追来了。我爬在房顶一个筐子后面隐蔽着，子弹推上了膛，想看看有多少人。如敌多我们就快点走开，但看到只一个人外别处再无人，我就想来后

捉活的。但当离我 200 米左右时，我认出像是你，后来越走越近，看准了，没错，就是营长……这时你带上我们这个班——这是你唯一的当时手中的兵力。直奔受伏地点，去找伤亡同志……当时的班长就是我。谈到这里能记起了吗？另外还有打紫荆关、大盘石，以及木厂村驻军等等供你回忆的事例。无法写了，太长了。我考虑这件事是比较突出的，所以写出来。

---

本文 870 字。

## 山洞避敌记

一九四一年秋，日寇又对我晋察冀边区发起了惨绝人寰的大扫荡。凡是日寇所到之处，基本上都是“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大好的村庄，变成了一片焦土，尸体到处可见，使人惨不忍睹。

当时我正在抗大二分校学习。我们第四大队住在河北省阜平县陈庄以东的高阳庄。因为日寇的扫荡，学校的学员都没有武装，只好同敌人进行大范围的到处周旋。当时我的大腿肚上的弹伤未愈，无法随大部队行走。学校领导就命令我带一个伤、病号班和一名卫生员，迅速进入陈庄以北的大山中进行荫蔽。因为都是伤病号，行动很慢。当我们向北走了不到十里路，南面就响起了激烈的枪声，而枪声越来越近。不一会儿就有一副担架抬着一个伤员赶上来经过。这是一个当地的民兵，被敌人子弹打伤了面部，子弹从脸的右侧打进从左脸打出去，还打掉了几颗牙齿，鲜血不时地从弹孔流出。两个老乡抬着担架气喘吁吁的急忙向北山逃跑，不少进山躲避的村民陆陆续续地奔向这座大山。这时后面的民兵同敌人战斗的枪声越来越近。跟随我们的这个小卫生员（只有十三岁）因见病号走不动，急得大哭起来。我叫他跑在前面找几根大木棍，交给伤病员拄着。这样才稍微加快了点步伐。我动员大家尽量走快点，否则被敌人追上，我们就非常危险。就这样我们大约又走了一个小时，好不容易走到这山沟最后一个村庄。这村庄只有十来户人家，村武委会主任见我们到来，急忙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打算怎么办？”

我告诉他说：“我们是抗大二分校的学员。我们这几个人都是伤病员，因无法和大队行动，奉命进山荫蔽。”这位武委会主任说：“敌人很快就会到达这里，情况十分吃紧。你们是想翻山过去呢还是想怎么办？”我说：“这北山高一两千米，这些伤病号是走不过去的。最好是就地荫蔽为好。”他马上叫另一个村干部指挥本村和外来的村民迅速疏散转移。他向我说：“这山沟里没有什么好地方荫蔽，南面半山崖上有一个石洞，我看你们和这五名各区的工作人员就到那石洞去好不好？”我当即同意。他立刻引导我们迅速向石洞走去。可你知道这山洞是什么样子？这位村干部一边走一边告诉我们：“这山洞是一个多少年前的本地出家人凿成的。”山洞位置选了一个大石崖的中央，这大石崖高百余丈，南北宽也有二百多米，是从山的上部向上直立，远看真像一块高大的石板立在这半山腰上。十分险峻。当我们走到这石崖边时看到这石崖是上下两大块接起来的。上下两崖的接合部位有一条像窗台般的宽一米，长约一二百米天然形成的台阶。台阶上

长满了野草。我们脚蹬着这台阶，身体紧紧贴着石崖慢慢地向南运动，因下半部石崖仍有一百多米高，向下一看非常眼晕和害怕。如稍不小心一失足就会跌落下去摔成肉酱。我叫大家用手扶住石崖，眼睛不要向下看。就这样有的人还是不敢站立行走而是蹲在台阶上慢慢地爬，有的人吓得发抖。就这样经过十多分钟才好不容易走到一处。突然出现一个洞口，这洞口宽不过两市尺多高不过一米。我们一个个跟着拐进了石洞。里面长宽高各近三米，很像一间屋子。真是一个再好不过的荫蔽地。武委会主任告诉我们不要出去，敌军撤走以后他来接我们出去。

我带的病号班八名同志和五名各区工作人员(三男两女)就在这洞内觉得十分安全。因根据我们进来的路径，是只能一个人一个人的跟着还得非常小心的行走才能到这里来。洞口又很小，站在石崖根部是根本看不到的。如离开四五百米来看，这洞口只不过盆口大小，如果没有当地汉奸带领，鬼子是怎么也发现不了的。我为预防万一，我叫大家捡了些石块堆在洞口两旁，又分配由两人轮班拿着我们病号拄着的拐杖在洞口放哨，万一敌人到这里他就挥头示意，我们就可用石块和木棍把他打到崖下去叫他粉身碎骨。

当时敌人已经把这座大山包围了起来，山下和山顶上到处都是枪声，有时还听到下面隐隐约约的狂叫声。判断敌人正在搜山。我们从洞口向下眺望，可看到山下的村庄到处浓烟一片，夜晚可看到火光，也听到急急缓缓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

当夜大部分同志都没入睡，相互谈论敌情的发展变化。

第二天，天刚发亮，就已听到上下都有的枪弹声。判断可能是鬼子又在杀害被搜出的人民群众或游击队在袭击敌人。太阳光照进洞口的一半，漆黑的洞内闪出光明。这时大家感到饥饿和干渴。因上山时的紧张和仓促谁也没想到我们会进入这样一个既无粮食又无滴水的山洞中。有的同志后悔地说：“早知道是这样，我从山下弄几个鲜玉米棒子进来该多好啊！”现在想来已为时过晚。这时还有一个难题就是怎样解决大小便问题。白天又不能出洞，又不能在洞内。男同志还好办点儿，可在洞口向外撒，女同志只好在夜晚走出洞外，沿着那不足一米宽的台阶向西走去解。好在我们没吃东西，大小便很少。就这样大家在这石洞里忍着饥渴一天一天地煎熬着。鬼子们不断地在山下搜索，我们口干比饥饿还难受。到第三天黄昏大家议论：“鬼子何时撤走还难说，我们总不能在这洞内被干饿死。”这时我们出了个主意说：“咱们来时的半山腰上有老乡开的荒地种的萝卜。能不能拔点来解决问题。”大家对此议论起来。觉得按当前的困境也只有这一条出路。我们弄来估计重量，出去后把钱交给主任叫他交给开地的人就行了。可是谁去呢？白天

进来的时候这条路这样危险黑夜再摸出去，稍有失足岂不是更糟吗？没办法我这班长只有自告奋勇。在另一个地方工作的一个同志也想和我作伴一起去。我二人就带了饭包（挎包）爬出洞门顺着来的路爬了过去。走了大约半个多小时，才摸到了这块萝卜地。迅速地拔了两饭包，约十多斤。又顺着原路摸了回来。大家一见欢喜若狂。这是大家的“救命草”。我警告大家要省着吃，因鬼子何时能撤走很难预料。我们就倚仗着这点萝卜，当饥渴难忍时就啃上几口维持着生命。就这样我们又维持了一天。到第四天上午，听见山下的枪声越来越远了，判断可能是敌人在后撤。太阳落山之前武委会主任进到石洞里来告诉我们“敌人撤了！”我们才走出山洞，大家凑了十几元钱交给了主任叫他帮我们还给种萝卜的人。

我们下到山底，见到山谷中的泉水潺潺涌流。水是那样清澈透明，真似琼浆玉液。我们不约而同跪在地上把头伸入水中猛喝了个饱肚。尝到了边区的山泉是那样香甜可口。

---

本文 2450 字。

## 虎口脱生

——记盘神庙战斗

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正处敌我相持阶段。春节前后我八路军晋察冀第一分区 34 团一营，驻军在易县西北约 40 华里处的上店、盘神庙、利儿村一带。这里高山峻岭地势险要。几年来我们就利用这里作为根据地和敌人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一个夜晚，北风呼号，刮得大树东摇西摆呼呼作响，我营（营部住盘神庙）和三连（住上店村）由教导员吕宝基同志（原公安部政治部党委书记）带领又去奇袭易县的敌人。夜幕降临之前我们就向敌占区进发。因为山口之外从东到西有东白马、主良村、南白羊等一字排开的敌人碉堡。要到达易县是必须通过敌人的这些据点、封锁不可。呼号的寒风虽然吹透了我们单薄的棉衣，觉得很冷，但风声又可帮我们的忙，使我们的行踪不易被敌人发觉，对我们的行动非常有利。大约在夜十点以前我们就到达了目的地。静悄悄地摸到敌人的一个警察局，敌人刚一察觉，我们的手榴弹就投进了他们的室内，把敌人打得乱成一团（详细经过简略）。几分钟就结束了战斗，迅速撤离，向原地返回。狡猾的敌人就利用我们撤回的机会，集合了几百人紧随我军之后，向我驻地——上店、盘神庙袭来。当时谁也没有料到，战士们高兴地回到原驻地。因一夜往返奔波 80 余里，已极度疲劳，回到营地就如回自己的家一样，进入房间就安睡了。哪料敌人紧随我军之后来到我们驻地进行反袭击。敌人绕过我们的驻地，有一股已奔向沙鱼村（这里是这个深山沟的最后一个村子，这里住有区政府部分人员）敌人是想把我们全部消灭。天将拂晓，我们正睡得香甜，忽听到西南方向传来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这是三连哨兵发出的紧急敌情信号，战争年代指战员们对此无不非常警惕。哪怕是一声枪响，大家也会迅速起来，这已成为习惯，何况连续的枪声。大家再困也是无人敢麻痹的。这时用不着任何人呼叫和催促以最快的速度起来，抓起武器冲出村外。开始吕宝基同志命令营部人员往北面的沙鱼村方向撤，可是没走多远，沙鱼村也响起来枪声。随后就见一群敌人由北向南冲过来。这时上店村三连驻地的枪声已是相当激烈了。在这紧要关头作为一个指挥员稍有迟豫就会使部队遭到难以估量的损失。这时吕教导员已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已被敌人包围，情况十分危急。他发现唯一的一个方向——东山没出现敌情，他当机立断，命令营部人员迅速爬东山突围。只要翻过这座高山就是利儿村，部营另一个连就在那里。可是营部的人员除我带的通信班之外就是炊事班和勤杂人员。并不像连队那样利索和敏捷。炊事员有的担着油盐担子，有的背着行军锅。在副官主任的带领下向东山爬去，我通信班在后面掩护。你知



道这座是什么样子吗？这座山高有六至八百米，除下半部稍加平缓外，上面都是六七十度的陡坡，而半山腰间有一层大石崖，崖高三四丈不等。从北向南像城墙一般连在一起向南延伸十余里路，到山的南端又绕向山的背后。你如去西陵旅游乘车沿公路向易县、西陵前进到东白马村一带时，你向北望去十余里有座高山，半山腰有一条高而长的大石崖，由南向北延伸，这石崖就和盘神庙的石崖相连。因这石崖有如刀切一般，要想爬上去是相当困难的。唯盘神庙东山一段有一处可以攀登的断裂处，这里有一狭窄的小路通向断处，断处有数蹬可供人们爬上攀下的石梯台阶，当地人们都必须由这石梯爬上去才能到达山顶。我营部人员就在吕宝基同志率领下急速向这石梯爬去。敌人就在山下用机枪、步枪对这石梯进行封锁，副官主任没等到达石梯之前就被敌人从后面击中，透过腹部倒在地上。有两名炊事员和营部书记（负责文书工作的）也在通过石梯时中弹牺牲。我指挥通信班在后边，边掩护边向山上退。当我退到离石梯百余米处时，吕教导员见我们上来了，他发出了命令：“张班长，你快派人下去告诉三连，东山上没敌人，叫三连快爬东山突围！”我听到这命令，深知这个任务的危险和艰巨。当时哪知三连现在何处？从盘神庙到上店的敌情一概不知，怎么样能找到三连能把这命令传达给他们呢？下去，很可能是肉包打狗有去无回！我稍加思考，决定绝对不能把这任务让通信员去执行，在此紧要的关头必须自己去！我把随身的米袋、被包取下交给通信员刘树琪（河北满城县鱼河村人），并告诉他：“你把我的东西都带走，我要下去传三连爬东山。”我为跑得快，身上尽量轻装，只带了三颗手榴弹，其中一枚拧开了盖子把弹弦套在小指上，飞身离开了战友，勇猛迅速地向山下跑去。当时心中只想很快找到三连，其他什么也顾不上想。这是狡猾的敌人见我下来了，（以为）是一个到手的俘虏。有十多个“鬼子”就藏在盘神庙村东小河的西岸，这里有老百姓怕山水冲坏他们的菜地而筑起的一道半人高的石墙。敌人就藏在这石墙后面不叫我发现。当我跑到小河边（这河有十米宽左右，河内常年清水常流，水深有一尺左右），想踏着老百姓摆在水中的石头跃过河去，我刚走到河的中央，十几个鬼子猛然站了起来，枪口对着我，哇哇喊叫，敌人可能认为我是来向他们投降的呢！我精神紧张万分，在这时我没有别的路选择，抡起右臂把手中的一枚手榴弹投向敌群。右脚往石上猛地一蹬，来了个侧转身，回头几蹿，跳回了河岸，以最快的速度，沿着山沟向回跑。敌人见我向回跑，十几支步枪一齐对我射击，子弹打在我的眼前和两侧，石土飞溅！我这时只是不顾一切地跑，当时的力量和速度后来我自己都难以想象。我只有一个念头：快跑、再快点跑！我被击中算我倒霉，如打不着是我命大万幸！

敌人一面向我射击，一面连喊带叫地追我。当时因河水很凉他们也可能不愿把鞋裤弄湿，加上敌人穿着皮鞋又很笨，像一群蠢猪在后面追。我偶尔回头看一下，只是拼死地跑，敌人追出一百米时我已二百米开外。这时我营部人员除负伤者外也大部爬过了石梯，可敌人仍对石梯进行封锁，我决心不再从石梯上爬过，就以侥幸心理向东南方向跑去。当时我想如果能碰到另一石缝，我就从另一石缝向上爬，如果找不到石缝我就向南跑，我自信我比敌人快得多，敌人是追不上我的。总会时间越长和敌人距离越大，我在石崖根底沿着崖根向南跑，跑了一段之后忽然发现石崖中真的出现两块石崖的结合部，在石崖缝隙中还长有荆条和枣刺。我毫不犹豫，决心从这儿向上爬。我脚蹬石缝，手中倒换着抓住荆棵、枣刺和石缝，几村几村地向上爬。我的手被扎得鲜血直流，但我顾不上这些，死劲地向上爬，只想摔下去无非一死，爬上去就是活路一条！……真是天助我八路，经过一翻搏斗，我终于攀上了这个石崖，当我攀上石崖顶时，身上一下软了下来，好像瘫痪了一般，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我在石崖顶部一躺，坚信敌人是无法攀上来的！躺了大约一刻多钟，我才起身向利儿村找去。真是石缝救我一条命，逃脱虎口又逢生。

---

本文 2630 字。

### **附：孔各庄脱险**（2005.04.09 在一耽学堂作“我的生命历程”座谈讲述）

有一次，我们在孔各庄驻军，一个连队驻康寡妇沟，我们排就驻扎在五里路外的孔各庄。防止敌人袭击我们呐！就派一个班去放军事哨，我们那个班前半夜半个班后半夜半个班，班长副班长还带半个班，怕敌人来骚扰，就到外面去巡逻去。脚上没有袜子穿，我就光着脚丫，光着脚那么走，一转转两三个钟头。就那么冻着。可是就在那个时候，就是那次战斗里面，赶我回来以后，前半夜是我带班的，我回来以后就躺下了，累得不行了，我就赶快躺下吧，把枪一搂，很快就睡着了。我刚睡着，外面四班长喊“干什么的？”我听见“啪”的枪响了，我说：不好！赶快起床。我起来以后呢，战士们就（已经）都跑出去了，就剩下我一个，剩下个电话员。这时候那敌人呢就从那个房背后山沟里打进来了，已经扑到院子里面了。我从那个屋里出来以后，日本兵已经进到院子里面了。电话员拆电话线晚了一点，把那个电话机抱出来。敌人已经在院子里头，我们两个从门里冲出来以后，院子里已经是敌人了。我抡着枪左右“啪”、“啪”的打，冲出一条路，我顺着那个坡就滚下去了。所以敌人也没把我抓住，很悬、很悬……那次晚上是敌人袭击我们来了。

---

本文 500 字。

## 一发山炮弹

一九四四年春，日寇对我国的侵略，已走到日暮穷途，接近他最后的死亡的边沿。毛主席高瞻远瞩，预料日寇完蛋之后，蒋介石必然要发动内战。党中央当机立断，就把晋察冀军区的一部分主力部队——一团、五团、九团，由抗日前线调往陕甘宁边区。我们一团（即有名的狼牙山五壮士团）是其中的一个。

有一天，我团刚吃完早饭，就立即集合从河北省易县高四庄出发。大家以为一定又有新的战斗任务要我们去执行了。所以指战员们都精神振奋和兴高采烈地迅速集合完毕向西南方向前进。走了大约七、八里路，到达了刘家台，当时晋察冀一分区司令部就驻在这里。一到村边，看到这里的气氛和场面，使大家马上改变了原来的猜想。村边已经集合了很多军民，是一个军民大会的会场。会场上有一群手里拿着二尺长、两头绑着红布条的花棍，脸上涂着粉红颜色的儿童，正在跳着霸王鞭舞。群众见我们到达，马上用非常热烈的掌声对我们进行欢迎。我们的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进入被指定的位置，在执日营长指挥下：“立正！向右看齐！放背包！坐下！”我们按照指挥员的口令，唰的一下，整整齐齐地做了下来。这时又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有几位首长摸样的军人走向了会场的前面。我们正猜测这几位是谁时，其中有一位首长开口讲话：“请大家都坐好，听杨司令员讲话！”我们很多人不认识那位是杨司令员，有一个战士便侧过头去问另一个战士，副班长马上批评：“不要交头接耳！哪位出来讲话哪位一定是杨司令员，还用问！”

（上面这段文字，就是战争年代杨成武司令员代表一分区广大军民欢送一团调往陕甘宁时召开的军民大会的简单会场和部队动作的具体记述。）我记得杨成武司令员的讲话大致如下：他首先表扬了一团指战员和其他部队以及边区民众在抗斗争中取得的辉煌战绩。然后接着说：“同志们！今天不是动员大家去打什么大仗，而是叫大家去执行一个特殊的光荣任务，就是要大家把一批非常宝贵、非常宝贵的东西送给毛主席去……（这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杨司令员当时没说这非常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当时我们都进入五花八门的猜想。大多数同志猜测可能是一批金子，不然为什么要连续强调两个非常宝贵呢？”

大会结束之后，我们又返回了原来的驻地——高四庄。午饭后各班派人去领要送的东西。结果出乎预料，原来领回的是每人一颗山炮弹。要求每个人以后就把这颗山炮弹牢牢的捆在自己的背包上，走到那里就带到那里。第二天，我们就从高四庄出发开始向

五台山方向前进。一路上大家还在猜：“这弹壳中一定是装有金子，不然不会这么重。”每个人背包上捆着一颗山炮弹作这样长时间，长距离的行军，不但在我军历史上恐怕是第一次，就是在世界战争史上也不一定多见。这颗炮弹背在双肩上，开始行走时并不感到太重，但是等走出几里之后就感受到它和一个背包加上一条米袋的特殊滋味。这个铜壳，钢头的“宝物”实在不太寻常。那双肩上的背包绳不知为什么越勒越紧，越勒越深，肩上的肉和骨头又酸又疼，走几步依靠脊背的力量把它向上颠一颠似乎好像轻了一点。但再走几步之后，酸疼是依然如故，甚至疼的更厉害，就这样每天背着这个“宝物”翻山越岭，涉水过河要至少走六七十里，甚至百八十里，那肩上难受的滋味用文字难以言表出来。但不论多么难忍、难受，我们有一个信念，相信杨成武司令员说的它一定是个宝物，所以再难忍也要把它背到目的地去。我们通过了五台山，继续西行，我记得当我们走到高山顶上的背阴处，坡上还是一层冰有些骡马蹄下一滑就倒在地上，四蹄乱蹬也爬不起来，还要几个战士使尽全身的力气去抬才把它扶了起来。又一天，我们走到一个大山顶部向南远望，下面是一块平原，十多里外有一个飞机场。有人说：“这里是阳明堡机场，我八路军某部曾在这里炸毁了敌人十多架飞机。”后来有一天为了夜间通过，白日在那里休息了半天，改变了常规，变成了夜里行军。后来才知道是太原以南的铁路敌封锁线。可是因敌人已发觉我们有先头部队通过这里，他们就在这里布下重兵，加紧封锁，这一次夜行军走了四十多里才到达铁路附近，但因敌兵封锁强渡没能成功，我们被迫又返回原来出发地。第二天夜又沿第一天的线路进行强渡可是又没成功，到第三次我们部队才在敌人封锁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通过成功。三次往返大家都非常疲劳，但都没怨言。这样我们从河北易县高四庄出发通过了完县、曲阳、阜平、五台山、繁峙、代县、崞岚、兴县到达了郭县。这里是晋绥军分区，听说贺龙将军就在这里。我们到达郭县后当地部队得知我们是从抗日前线而来又是狼牙山英雄团，就拿出他们自己生产的红小豆和小米来慰劳我们。在没进宿舍之前，指导员对全连讲话说：“这里是我们晋绥分区老大哥部队。今天，他们要把他们自己种出的粮食慰劳我们。今天的饭炊事班不统一做，由各班分做。粮食由各班根据自己班的人数，能吃多少就下多少以吃饱为原则，千万不要浪费！”我们班也就用红小豆和黄小米做了一锅饭，吃的非常香甜可口，这一顿饭我吃了八碗饭，至今回忆起来，我也难说我的肚子为什么能装那么多！饭后，我当着全班的面说了以下的话：“今天我的肚子真吃饱了。这是我有生以来吃的最饱的一顿饭，以后如果我每天都能吃这么饱，我再也不提意见了！”这句话成了我一生刻骨铭心

的誓言。至死也不会忘记它。

经过长距离的行军我们背着这颗炮弹，经河北、山西到底走了多远的路我也没法计算，最终渡过黄河到达陕北的葭县（今陕西佳县）。总算完成了杨司令员给我们的“把非常宝贵的东西送到目的地”的任务。

一九四七年春，我西北野战军又对胡宗南的 123 旅在沙家店组织了一次围歼战。我记得非常准确，当时敌人的两门大炮疯狂地同时向我进攻部队轰击。我军为了迅速地攻占席吉坡敌军阵地必须把敌人炮兵阵地予以摧毁，就发出了一发炮弹，就用了一发炮弹就把敌炮给打哑了。当时我们攻占了敌人阵地后我走到敌炮兵阵地上看，敌人的一门大炮的炮轮被炸飞了，炮身和炮架分了家，拉炮的一匹骡子肚子被炸开了膛，肠子流在地上。有谁能知道击中敌炮的这发炮弹是那位同志背到陕甘宁的呢？到这时我们才深刻的体会到它的非常宝贵的真正含义。

---

本文 2410 字。

## 孤身俘敌记

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开始了向我陕北根据地的进攻。我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为了达到歼敌有生力量最后解放大西北和全中国的总战略目标，主动放弃了延安，在陕北根据地和敌占区与敌展开了大规模的运动战。

一九四八年六月我第一野战军在彭总指挥下接连取得了歼敌数万余的伟大胜利之后，又集中了一纵队、六纵队的主力对驻守在刘家凹、梁周村之敌 36 师的围歼战。我军以迅速行动对刘家凹、梁周村进行了大范围的包围。敌人怕我对其两处进行分割歼灭就在当天将刘家凹之部队全部撤到梁周村妄图在梁周村和我军决死对抗。我两个纵队则把梁周村团团包围起来并一步一步地向梁周村内压缩。我六纵第三团就和本纵队友邻一起在梁周村南面与敌对峙。并对敌展开了政治攻势。

在我军对敌压缩包围圈的同时，敌人也在沿村边一二百米范围内加挖工事。这时政治部主任刘亚民叫我：“张参谋，你看那个敌人在干什么？”我抬头一看是一个上身穿着衬衣的家伙正用锹掘土，大半身子露在上面。我立刻叫“通信员把枪给我！”刘亚民说“我用望远镜给你看着。”我接过通信员手中的捷克式步马枪把标尺推到二百米刻标，依地坎做依托，稳稳地瞄准了他，扣动了扳机，“叭”的一枪，倒在地坎边，这时刘亚民同志高兴地喊“打中了！打中了！”后又接上一句“你真不愧是每次打靶的第一名！”一九九七年刘亚民同志患病我去探望他时，我们又一次回忆了当时的情节，对往事仍十分高兴（刘亚民同志在全国解放后奉命去澳门工作后来回中联部）。

当夜九点半左右，团部接到军指挥部电话传来总部下达的要求全军在今夜十一点对敌三十六师发动总攻的命令。这时阴云密布下着小雨。天黑的简直伸手不见五指。梁周村周围的枪声阵阵不停。我们团参谋处的几个参谋正议论对今晚的战斗发展情况。团长伍生荣叫我“张参谋，你马上去前沿一连告诉他们今夜十一点配合友邻部队总攻！”这时我的左脚有伤。是因为在那天夜晚对梁周村实行包围时，我的脚上穿着一双用布带缀在鞋底上的鞋。脚心的右侧扎入一根枣刺，当时还很疼。但在战斗中我再疼也不会说它。我当即喊通信员孙计栓（他的入党是我介绍的），“走！跟我去前沿传达命令。”我带着孙计栓，踏着泥泞的土地，忍着刺骨的疼痛向前沿阵地摸去。团指挥到离前沿约五六百米，不一会儿我们接近梁周村村边，这是一座大庙，一连连部就在这庙里，接近庙宇，庙门哨兵发口令问我，我以规定的暗号回答。进庙后连指导员和卫生员、司号员等都在

这里，我原本地把团长的指令传达给了他们。我在团长的命令后面，又特别加了一句：“祝你们攻击成功，多抓俘虏，多得胜利品！”命令传达完毕，我走出庙门，向西一望，只见一个黑影在离我十几米远处活动，我当时以为是一连的人，就用不太大的声音喊了一句“哪一个？干什么的？”这个黑影当时可能也把我误为他们的人也不答话就一步一步地向我走近。当他走到离我只有不到三米时，我看到他身上穿着不是军装而是白色衬衣。我立刻断定他不是我们的人。我本能地食指伸入扳机护圈，伸出我的左手向前猛一个箭步想抓住他，但这家伙反应也很快掉头就想逃跑，这时我更断定他是敌人无疑。我清醒地认识，在这万分紧张情况下，我不立刻开枪要么他会逃脱，要么他回首一枪就可把我打倒，我果断地抬起右臂扣动扳机，正中他的后背应声爬在地上。我迅速向前用枪顶住他的头，说“不要动！动就打死你！”这时孙计栓同志听到我的声音跑到我跟前。这家伙战战兢兢地答：“我不动，我不动。”我又问“你是干什么的？”他答“我是特务长”（我军叫司务长，敌人叫特务长，专管伙食的），这时我从他手中夺下一个手电筒，一卷地图和一只手表。我当时指着他手里的一卷纸问“这是什么？”他说“是地图”，我说“你还骗我！你当特务长哪里来的地图？显然是一个军官。想跑回西安去。是不是？”我接着命令他：“站起来！跟我走！”他说：“长官，我实在起不来了。”我把他交给了一连，然后向团指挥部返回。

我和孙计栓离开一连向回走了不到二百米又见左前方一群人影。这时我才意识到敌人可能是突围了。所以倍加警惕。我立即又向这群人影发出口令：“口令！干什么的？”这群人影听我叫：“口令”。他不回答，并很快猫着腰窝向一个半人多高的地坎。我和孙计栓紧走几步到地坎上面，命令他们把手中武器放下，站起来，不准跑，谁跑马上开枪打死！这时孙计栓看到离这二十米处又一群人在运动，他端着冲锋枪冲了过去。（他追过去后再没回来，也没回团指挥部。天亮后打扫战场，有人发现他已牺牲。）这时我一个人感到孤立无援，但又没别的办法，就继续对他们威胁说：“前面都是我们的人，你们跟我走，不会有危险。否则你们就活不成。”这群人站了起来，我叫他们排成一行，然后说“前面这个人 是班长，后面这个 是副班长，一个跟着一个向南走，长短别跑，跑就死路一条。”我数了数共十三人，他们按照我的命令乖乖地走到团指挥部。我当时也捏着一把汗。

我回到指挥部后，俘虏由通信员看起来，向他们交待政策。从敌人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们已是丧魂落魄不堪一击了。

这时离总攻时间不远了。可敌人开始突围了。我的口中干的要命。非常想得到一口水喝。这时我忽然想起我去前沿传达命令时的半路上，曾碰到一块西瓜地。脚下的西瓜都有碗口般大，我心生一念，干脆去摘个西瓜解解渴。我起身又向西瓜田走去。刚走出一百多米，就听到左前方一阵呼噜呼噜地乱响声。立刻又看到一群人影向南急跑。这时我断定又碰上突围的敌人了。我当时孤单一人也很紧张，但附近没有部队和同志，在这紧急关头，我只好鼓足勇气，大喊一声，“那一个！干什么的？”我口音刚落，就看到空中有零星一串火星，随即砰的一声，一个东西落在我的左侧的很近处，我清醒意识到这是一枚手榴弹，我这时来不及卧倒只好转身叫它炸我后背，这时，轰的一声，手榴弹在我身边二、三米处爆炸了，炸弹的气浪把我的衣服推得紧贴肌肉，但没炸着，我急中生智又继续大喊：“你们敢打，再打我们就要开枪！”我喊声之后，敌群中有人答话：“我们不打。”我喊“不打把武器都给扔下！”敌人被我的喊声吓破了胆，就听到噶噶的一阵声响，敌人果然把武器放下了。这时我右侧也有人喊“快交枪。我们不杀伤俘虏！”我听到有人来助我，我胆子更大了。命令敌人：“来，向我这边靠拢！”这时原来是团指挥部右侧的机炮连副指导员和一个通信员过来了。我喜出望外内心想好险啊！真是危中的万幸！”在我喊“你们再打我们就要开枪的时候，我只有孤身一人，手中握着弹夹中只有六发子弹，而在一小时前已打了一发，只剩五发子弹的一支手枪。周围根本没有我的部队。把敌人吓得丢下武器这是天大的万幸。敌人在我们三人监督下回到指挥部。数了数有战马十二匹，俘虏 26 人。经问：“这是师部人员和重机枪排的。”

经过两天两夜敌三十六师全部被我歼灭。

我在这一战斗当中，亲身同敌人先后进行了三四次的搏斗，总共在我手中打死打伤敌人两名，生俘敌三十九人，战马十二匹。这几个搏斗场面，对我来说都是偶然的，但又是十分危险的。我的取胜不是我的实力而是我的勇气，用勇气压倒对方。

战斗结束后，团长伍生荣（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得知我缴获了一块好手表，他要用他的一块破表与之对换。我不从。副团长任瑞昌给我谈话，让我把表交公。我说“参谋处的值班也需表，参谋值班误了时间会处分参谋，为什么不能留在参谋处用？”后来表仍被团长收去。最后刘亚民同志找我谈话说：“要不是你为了表和他们闹，这次本来要给你立一大功的。”

对这一战斗过程比较知情的人，

团长伍生荣（兰州军区副司令员）



主任刘亚民（中联部）

见习参谋李胜藻（在哈密）

王克臣 当时的机炮连长 在易县离休 住县离休办。

还有当时团部的人员（不知在何处）

---

本文 3070 字。

## 怀念八路军的妈妈

一九四一年我在河北省灵寿县陈庄一带的抗大二分校学习。在学习期间我和我们中队的文化教员同时传染上了一种死亡率很高的病——回归热。文化教员得病不到一个星期就被病魔夺取了他那年轻而又宝贵的生命。而我经过十多天的高烧之后身体也十分虚弱了。这时正好赶上学校要组织学员到外地进行实战演习，中队领导看到我病未愈决定把我寄托给我们的房东——一个老太太家中，可是我不愿离开中队就请求随队伍出发了。当夜我们从高阳庄出发向东大约走了六、七十里，天亮后到达一个村庄（这个村庄我因病没问请叫什么村名而遗恨一生）我影影绰绰好像听到这个村庄叫中五合。我因病本来就没好再加上一夜行军劳累，到达该村后就又高烧起来进入昏迷状态。中队领导怕我再传染上别人就给我另外找了一个房东，我躺在老乡的一间空着的土炕上，一连三四天高烧不退，不吃也不喝。这时房东——一位四五十岁的老大娘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孩走进了我的房中，用慈母般的口气向我说：“孩子呀！你离家很远，你的病这么重，一定要想法子吃东西，不然会坏的。”我答：“大娘，我什么也不吃。”

大娘离去之后，不知她从那里找了一点麦子面和韭菜给我包来了十二个饺子，她一手抱着孩子，一手端着这碗饺子送到我的面前。我一见心中难过极了。因为我清楚当地的人民因日寇烧杀掳掠连吃的口粮都没有了。她怎么会给我弄到这白面给我包饺子呢？我流着热泪仍拒绝说：“大娘你快端走吧，我实在吃不进，我的病很重会传染的，你快离开吧！”可是这位大娘不但不走用筷子夹起一个就往我嘴里喂。一边喂一边说：“你一定要吃，不吃就对不起我了。”我勉强开口把第一个饺子咽了下去，大娘见我咽下了第一个饺子，一边说：“好！好！”紧接着把第二个第三个接连喂进了我的嘴里，当喂到第六个时我口中发出呕吐的样子。这时大娘才不得不停了下来。又说：“好！咱们休息一会儿再吃。”

第二天大娘又给我端来半碗玉米粥，用小勺子一勺一勺地喂进了我的嘴里。

几天过后，我的病稍有好转，村中弄了一付担架抬起我离开了这位老大娘。我想要不是这位老大娘的照料可能我早就和大家永别了。几十年中我碰到有关的事我总是用老大娘这颗善良的心作实例来教育自己的亲戚和同志。

一九五〇年我调来北京之后我总想去报答这位老大娘的恩情。我从北京给河北省阜平县中五合村党支部发去一信，信中并附了一张邮票求党支部按照我提供的线索帮助打

听这位老大娘。我的信发出去半个月后又原信被退了回来，这件事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永生的怀念和遗憾。

这件事至今已过去了六十个春秋，老大娘如果健在现在也有一百一十多岁了。我只有好好地为人民服务来报答老大娘的恩情了。

---

本文 1060 字。

**注：关于以上故事，另参考：**

**2005.04.09 在一耽学堂作“我的生命历程”座谈录音有关讲述**

41 年，（部队）让我去抗大学习。我们队里头得一种病叫“回归热”，那个病很厉害的，有个教员得这个病就死了。我得了病就住在老乡家里，我们要去演习，去六七十里外的那个地方演习，说是演习实际上是战斗去了，去打敌人去了嘛。我觉得把我留在这我也不愿意，没病死也算便宜我，我稍微好一点，因为我烧大概一个礼拜就减轻了。当时部队要把我放在那儿，我不同意我要跟部队走。后来我跟着部队就出发了，走出去六十里路，到那地方以后马上又犯了，又开始发烧了。指导员说你去上山头上看着吧，看着我们演习完了以后再下来，当时我的身上烧得受不了。后来就把我安排到老乡家里面，老乡家里面有两间西房还有两间南房。就把我放在老百姓家里西房里那个炕上，我三四天也不吃东西也不喝水什么也不要。这时有一个中年妇女抱着孩子，就过来看我。当时那个传染病很厉害的，好多人都不敢靠近我。这个大娘就来了，说：“孩子，你吃什么啊？”我说：“我什么也不想吃。”她就说：“你还要吃饭啊，你离家很远也没人照顾你，你不吃（身体）就坏了。”就劝我。我说：“我什么也不吃，我就想喝点醋。”她说：“那容易，我给你找去。”一会儿用个小碗就给我端了半碗醋。说你喝吧，我一喝很苦，我说：“大娘这是醋吗？”她说：“怎么不是醋。“我就不喝了，太苦了喝不了。那个大娘不知从哪里（弄了一点面粉）给我包了十二个小饺子。那时候老百姓没有粮食吃，粮食很少的。我不吃，实在吃不下去啊。她一个手抱着孩子，一个手拿着筷子喂我，硬喂我吃了六个饺子。她说：“你不吃、不吃身子就坏了。”就这样硬喂着我吃了六个饺子。到现在我记忆犹新，那个老百姓老大娘喂我的六个饺子。到了第二天，部队要出发要走了。（我）走不了了，那个医生在我的床前转，来了好几次。最后他说：“不要紧了，今天给你打一针。打一针你就好了。我告诉你，我来了好几次不舍得用这个针，今天给你

用了。这一针要四块白洋啊，是从石家庄买来的，叫 606。”我到现在不知道 606 是个什么东西，是个什么药。打了针下午就给我用担架抬着走了，一走走了六七十里路，都是用担架抬着走。后来我到了北京给老大娘写信，因为我当时也没问她叫什么名字，那个村我也只记得好像是中五河。我就写信写到中五河党支部，写一封退回来，写一封退回来，找不到这个老大娘了。没法报答老大娘的恩情了。

---

本文 970 字。

## 一支不寻常的毛笔

在我的写字台上的笔筒内的毛笔中，有一支叫人看起来很不显眼但实际上却是一支极不寻常的毛笔。这支毛笔不像现在市场上出售的那些毛笔，现在市场上卖的毛笔，除了笔竿的竹子使用了各种颜色之外，笔竿的两端还用牛角之类的东西做成精美的装饰品，尽管笔竿极其讲究和美观，但在毛笔的核心部分——对毛料的选择和制造工艺上却粗糙异常，叫你买到手无法使用，只能作为有些人想把自己装扮成“文人墨客”的装饰品。而我的这支毛笔，看起来极其普通；其笔竿是用 7.8 毫米粗 158 毫米长的一根黄色（原竹色）的普通竹料，一端装上普通毫头，笔竿上刻有一行精美的小字是：上面有两个“极品”二字横排在一行小字的顶部，“极品”二字的下方刻有“纯净北尾狼毫小楷”，右下方是“美昌自制”四字。一般人看到它的外表，若拿人的贵贱分类，就会把它列到贫苦劳动人民的行列——同志且慢，请你莫用错误的目光来看待它。允许我向你介绍一下它的身份和来历。

上面谈到笔竿刻字中有“美昌自制”四字，我也没去考察，只能知道这是毛笔生产厂家的名号。经我多年使用证明，这个字号是旧社会“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名牌货。

现在说说它的来历。这支笔何年何月出厂无法考察，但到我手中时是 1949 年的深秋时节。那时，我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大将军指挥下，在夺取了陕西西安之后挥师继续西进直通兰州。兰州当时是马家（马步芳、马步青、马鸿宾、马鸿奎）和胡宗南在中国大西北的第二重要战略要地。北靠黄河，南面以三营子、狗娃山等高山为屏障，依仗着他们几十年修筑的工事，由马家军主力进行固守。我西北野战军第二兵团（以六军为主力）和十八兵团对兰州进行强攻夺取。经过半个月的激战，敌人修了几十年的阵地终于被我全部摧垮，夺取了敌人的全部核心阵地。我们站在三营子山顶上俯瞰兰州，全城尽收眼底。敌人南面屏障被我摧毁和占领，兰州守军一下变成丧家之犬，顷刻丢魂落魄溃不成军，丢弃兰州城，抢渡黄河大桥，沿河西走廊向西逃窜。敌人为阻滞我军追击，把汽车停在了黄河大桥中心把汽车点燃把桥面烧毁，我军则冲过火海急进尾追。另以六军一部沿黄河南岸向西追歼逃敌，在很短时间内攻占了七里河。七里河是国民党西北行辕长官公署，鲁大昌的所在地，当我们攻进了这个公署大院后，进入了一个建有两层楼的楼房。这正是鲁大昌的办公处和宿舍，我们进入其办公室后，室内那些豪华设备和用具

使我们这些长期钻山沟的“土八路”真大开眼界。有的战士触动了钢琴的按键，钢琴发出叮咚声音，以为里面还有敌人；有的战士搬取遗弃的东西和银元……我对这些不感兴趣，就直接冲进了他的办公室，想找到一点有用的文件。拉开抽屉，里面和地上一样，一片狼藉，只有一个抽屉内放有一捆毛笔，大约有二百支，我抽出一支一看笔竿上刻有“极品、纯净北尾狼毫”等字我喜出望外随手把笔捆解开取出了大约五十余支，装入了我的挎包内，以备以后办公时使用。到了晚上，夜幕降临，我们暂停追击，进入宿舍，我拿出毛笔一看，上面的刻字，如出一模。第二天又继续追击，当我们追击到永登县时得知敌人在乌梢岭上抵抗。为全歼守敌不使西逃，我团奉命奔永登以东想绕过永登以东的高山，绕到敌人背后将守敌包围歼灭。在当天夜晚我们翻越永登以东高山时天降中雨，九月的大西北虽说还不是太冷，但因山峰太高雨点落在身上已成冰雪了，加上我们身着单衣，当夜有两位战士冻死在途中，我也被冻的说不出话来了。我只记得半夜里我们进入一个叫乱柴沟的村庄这里老百姓烧的是一种泥煤，极好点燃。我们就点燃泥煤在地上烤衣服，饭后又继续向乌梢岭进发，我被老乡用毛驴驮着进了武威城，这时我既不能说话也不能动弹，当即被送入当时我军设在武威城隍庙的临时医院，这医院里有几位护士和医生负责对伤病员进行治疗。我被放在一间门向北开的破庙里，北墙角下铺了点麦草，这就是我的病床，没什么医药，几天也不吃饭，我的唯一的一个盖物（皮大衣）和麦秸上拉的满是屎尿，这时我高烧不退迷迷糊糊，我认为我难以活下去了，就把一纪念品——一支眼的望远镜（这个望远镜是我们团长冯配岳留下的。他在打宜川时在凤凰山上被敌人用迫击炮炸瞎了一只眼睛，这支望远镜也同时被炸坏了一支眼，冯配岳同志去住院就把这支望远镜给了我），掏出来送给了一位年仅十三岁的小护士，这些毛笔也想给他，他说“没用”，所以就一直没离开我这个挎包。一个月后我被送回兰州兵团后勤部。

一九五〇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成立装甲兵坦克部队，我又随二兵团的一部分干部（其中有兵团司令后来是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一起被调来北京装甲兵司令部。这些毛笔一直也没有离开过我。后来我把这些毛笔作为珍贵礼物送给过一些同志。我离休之后决心学写毛笔字，就用这几支毛笔作为主要工具，练了几年，至今毛笔只剩下一支了，有几位爱好书法的同仁劝我不能再用它了，要把它作为历史文物保存下来。这就是这支不寻常的毛笔的全部来龙去脉。

我用这毛笔写出的书法作品曾多次参加书画展览并多次获奖。也应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的约稿为其写过两份《为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国家

收藏纪念作品，一份是“为人民服务”，一份是“纪念白求恩”（都是全文抄录）这两份作品都是小楷正书，每字约八平方毫米，已于1995年十月发给我《收藏证书》，收到的“收藏证书”现存我手中。

---

本文2120字。

##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2005年8月8日

今年8月15日是我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了八年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之后取得最后胜利的伟大纪念日。在这个值得我们中国人自豪和骄傲的日子里，航空资料研究院党委为我们这些曾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同日寇殊死搏斗、浴血奋战过的老战士们举行这样一个聚会，（我）感到十分高兴。我作为其中一员能参加这个聚会感到很荣幸。

日寇占领我华北时，我曾在保定、北京等地在日本铁蹄下当过劳工，我是一个亲眼目睹了日寇侵略中国和对我国人民烧杀抢掠的历史见证人。我家地处河北省满城县，我不忍心当亡国奴，就于1940年3月参加了八路军。所以我是一个为反抗日寇侵略而同敌人进行过数十次搏斗的老战士。六十年过去了，可是那日寇以世界上最野蛮、最惨无人道的对我各族人民所施行的三光政策的暴行事例我是记忆犹新刻骨铭心的。时至今日，我还经常做梦同鬼子进行搏斗和厮杀。八年的漫长历史中，我所目睹和经历的诸多事件，要想在这短暂的时间内全部诉说给各位是根本不可能的。现在我想让大家听一个当年来我国进行侵略的日本兵他自己所说的他是怎样屠杀我国人民的片段，这可能比我们说日本鬼子是如何残暴和无人性可能更有说服力。

这个曾来参加侵略我国和对我国人民亲自进行屠杀的日本兵叫近藤一。下面就是一个叫漱口晴义的记者采访他后所写的报导：“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940年，近藤一跟随日本陆军独立混合旅独立步兵第13大队开赴中国山西左权县，那里是中日战争的最前沿。到达那里后，新兵接到的第一个命令，便是用杀刀刺杀中国人的训练。训练的靶子就是两个被反剪着双手绑在树上的中国俘虏。接到教官的命令，我们就冲上去对准那人的左胸刺下去。刺刀刺进他的胸膛那一瞬间我的腿突然停止了抖动，就像用筷子插进豆腐一样，毫无罪恶感。和我同一个部队的老兵们乐于在村落里寻找年轻的女性，然后集体轮奸她们。在一场讨伐战中，他们还让一个被轮奸过的刚刚分娩的年轻母亲浑身上下只穿一双鞋子和我们一起行军走路。在行进间一个老兵突然从这母亲的怀里夺过婴儿狠很地抛下了悬崖。这个母亲撕心裂肺地哭喊着，纵身随着婴儿也跳下了悬崖。士兵们



看到这一幕都高兴地哈哈大笑起来。这场面就发生在我的眼前。”

近藤说：“他为了搞清楚一个子弹的威力到底能串透多少人，就弄来十名男性，让他们前胸贴着前一个人的后背站成一列。然后用枪抵着第一人的后背扣动了扳机……那些士兵还用刺刀拉开了孕妇的肚子，削掉老人的耳朵。这场看不到边的拉锯战中，日本军队就是重复和继续着他们的残虐的暴行。”

近藤还说：“从小老师就教育他们，大和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因此让我们觉得不论怎样对待这些身为劣等民族的中国人都不为过。现在想起来，我犯下的罪行一百年也偿还不清。”

看！上面近藤这段自己回忆自己的所作所为的叙述，可能比我去诉说日寇的残暴行为更有说服力。

在八年抗战中，我国全国各地类似近藤甚至比近藤更残忍千百倍的罪行，到处都可见到。如举世共知的南京大屠杀，只这一地就残杀了我同胞三十万！全国其他地方，这里有日寇造下的千人墓，那里有万人坑！全国有多少妇女被日寇强奸！？有多少房屋被日寇给烧毁，造成的一大片一大片的无人区！？谁能用准确的数字来说清楚？中国有句成语是罄竹难书，用在这里是非常恰当的。

据我国官方公布的数字，八年日寇残杀的中国人有 3500 万之众。我看实际上比这个数字要多。因为据我所知，只在我当班长时，我们班有好几个牺牲了的同志至今他家还不知道。另外还有的战士上午刚参加八路军编入班中，班里的同志还没记住他的名字，下午就牺牲了，如和我一同参加的同村新战士桑造儿，参军不久就牺牲了，他家没有亲人，谁去统计？

在八年抗战中，我全家人都投入了抗击日寇的斗争。在斗争中只我一家人中就造成了二死、一残、一伤的悲惨结局和代价（我大叔张景林先我一年参加了八路军。在黄土岭战斗中——也就是被我军打死的日本阿部规秀中将的战斗中——牺牲了，我三叔张景年被日本飞机炸死了，我胞弟张永禄也在参军后被打瞎了双眼，致成一等残废，我本人也几次负伤，只是万幸在枪林弹雨中漏了下来，没有丧命。像我这样的家庭在全国还有很多。

所以我说在八年抗战中，我国人民在抗日斗争中所遭受的苦难，所遇到的艰难险阻，所付出的重大代价，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

我国八年抗战所以遇到那样极度的艰难，是有很多原因造成的。下面就说说我的亲身感受：

首先，从前面所介绍的日本兵近藤的自述中可以看到，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是由来已久的。他对本国人民从幼小就开始灌输妄图吞并中国的教育。日本为了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曾作了精心的策划和长期的准备。他先强行侵占了我东北三省，把东北三省作为他侵略和灭亡中国的基础。他们训练了二百多万精锐的军队；从物质上准备了能打几十年的精良武器和装备；在思想上灌输了武士道精神……

我国当时的政府，是一个由蒋介石领导的腐败无能的政府。再加上多年来的军阀混战，我国当时的四亿五千万同胞纯属一盘散沙。所以上百年来，世界上的列强都来长期对我国施行侵略掠夺，人民已经贫困到了极点。世界列强们称中国是东亚病夫。所以，当日寇发动卢沟桥“七七事变”后，很多的中国人认为“日本是不可抗拒的”。连蒋介石也不敢下令抵抗，认为抗战必亡。所以很多人没有抗战的信心。在日寇已经占领了的国土上有相当多的人就甘愿屈服当亡国奴，大汉奸汪精卫带上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投降了日本，并帮助日本来打我八路军和新四军残杀我国人民；被日寇占领区内不少地主、地痞流氓、土匪及一些认为“中国必亡”的人们，就投靠了日本，有的为日本人服务，有的当了汉奸，去杀害自己的同胞骨肉。

日本占领了我大半个中国之后，控制了我国的经济命脉，所有的铁路、交通、矿场和产量地都控制在了日本人手中。日本还对我八路军边区根据地采取了蚕食政策，对我边区进行步步压缩，将我八路军压挤到人烟稀少，没有多少产粮土地的深山之中。再加上在边区周围挖封锁沟、垒封锁墙、立碉堡，这还不够，还要经常集结兵力，侵入边区内地进行疯狂扫荡，他们每到一地实行三光政策（见人杀光、见房屋烧光、见东西抢光）……在这样环境下边区人民本身生活都极端困难，还要来供养抗日的军队，困难就可想而知了！战争到1941年时，边区已困难到了极点。

我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人民就是在这样既缺枪弹又缺钱粮的环境里，凭着满腔热

血同敌人进行着殊死战斗的。

**（编者按：以下回忆塔崖驿战斗的故事已具见前文，此略。）**

在那个年代里部队各方面都是非常困难的：

一，首先是吃的粮食紧张：

饿着肚子的滋味有的同志可能尝试过。在那战争的年代里，我可以这样说，一年之中很少有吃顿饱饭的机会。当时部队规定的定量是十六两的秤每人每天三钱油、三钱盐、十一两小米。但实际上是根本保证不了的。往往是缺粮断顿饿肚子的。饿了怎么办？我们只好采树叶当粮，我告诉大家我们为了充饥几乎什么能吃的树叶都吃过。冬天没树叶了，我们到河里捞水草（榨草）边区里当时找不到榆树了，因为除了榆树叶子被采吃了外，榆树的皮也被老百姓扒光了当饭吃。所以榆树都被吃死光了。至于油盐更是没法子保证的。我清楚的记得，我和不少同志每人挎包里常有一个拇指粗的两三寸长的小布袋，里面装着一点盐，在吃饭时当菜吃。那点盐是用上级发给的每个月的一点津贴费买的。当时每人每月发一元钱的边区纸币。这一元纸币发来时首先要扣下七角钱，用作百姓给我们做的鞋的一点报酬。剩下的三角钱供吸烟的同志买烟叶，不吸烟的则用它去买盐当菜吃。因为粮食会缺乏，饿肚子是家常便饭。小米弄不来就吃黑豆。有几次我们刚上完早操，马上要开饭了，这时突然枪声响了起来，这样做熟了的到口边的饭谁还能顾得上吃？赶快抓枪集合冲出村去。就记得我也真吃过一顿饱饭。那是1944年，我们这个团奉命每人背一发山炮弹从晋察冀一分区送往延安去，部队从易县刘家台出发经完县、尉县、五台、繁峙、代县、崞岗等地到达了山西郭县，这里是贺龙将军领导的晋西北根据地。当地军队看到我们是从抗日前线回来的部队，他们称我们是老大哥。对我们非常亲热。就把他们利用战斗空隙种出的小米豆子慰劳给我们做饭吃。当时指导员对大家说：“这是咱们的战友们自己种出的粮食慰劳给我们做饭吃的。今天由各班领回粮食由各班自己去做饭吃，能吃多少就下多少米，以不浪费为原则，管叫大家吃饱。”我们班领回粮食把饭做熟之后，我一下子吃下了八碗（军人用的洋瓷小铁碗）饭，肚子真涨起来了。我当时说：“这是我参军以来吃的最饱的一顿饭。以后如果每天能叫我吃上这样饱的饭，我就心满意足了！”当时当班长是更难，因为经常吃不饱，肚子总感觉饿。每到开饭时，

班里派两个人去打饭。把饭打回来，班长叫大家先去盛，大家盛饭时都很自觉，谁也不敢把碗装得很满，更不敢用筷子去向实里压。战士们盛完了，我叫大家开始吃，这时我才去盛。大家吃起来速度是惊人的。一碗饭几秒钟三两口就咽入肚子里。饭吃没了，可肚子里还是觉得空空的。有时我带一个班或半个班外出去执行特殊任务。中午回不来，就需向村中老百姓派饭吃。这时，就找到村长，向他说明来意，可村长把我们派到谁家去吃呢？他也很为难的。因他知道家家都是缺粮吃的。我们如果是五个人，这时村长往往要把我们分派到两三家去吃。因为知道一家老百姓是管不起多人吃饭的。即便是这样，有时村长把我们领到一家去之后，那家主人会说：“村长，不瞒你说，我家真的连一粒米也没有了。”这时村长无奈只好又把我们带到另外一家去。吃饭时，我每看老乡的表情，是很难的。因为饭量不多，而质量又差。老乡自觉为难。老乡先叫我们吃，我们看到盆里的饭量已不多了，也就不敢再吃了。生怕老乡挨饿。吃完饭后由我给老乡开这样一张白条子：“兹有一团二连三班张永儒二人在李某家吃饭一顿。此据。张永儒某月某日。”条子交给老乡嘱咐他好好保存，以后可到政府领回一点粮食。可是这条子往往是保存不下来的。只有少数的能够兑现。在连里开饭时我们都盼着自己去站岗。因为放哨站岗的人，他的饭不分到班里去给留在伙房，伙夫同志往往会给岗哨同志多留一口，同时往往会给留一块锅底上的锅巴，哨兵就可多吃一口。

为了吃饭去筹粮十几个优秀的战友牺牲了生命。**（编者按：以下回忆运粮遭遇袭击的故事已具见前文，此略。）**

二是武器弹药难。

上面谈到我参军一进班里就领到了一支枪和五发子弹。这在当时就够宝贵的了。打仗时我们每打一枪，连里规定我们要交回一个子弹壳。说是送回后方去再做成子弹。有次我带五个战士外出执行任务，路上和鬼子遭遇了，我们急忙向敌人开枪。当时因情况紧急没来得及拾回弹壳。回到连里后，连长在队前指问我：“张永儒！你今天消耗了三发子弹，打死了几个敌人？弹壳呢？”幸好不止我一个人在场射击，要没有其他同志，我真有言难对了。这样我们都有了经验，在后来的战斗中，多留一个心眼，在缴获了敌人的子弹之后，不全部上报。如缴获十五次只报十发，留五发给自己。即便如此在战斗

中我们都知道不是有把握时是不轻易出击的。深知一发子弹在关键时刻的价值的。

抗战到了 1944 年，这时日本鬼子的疯狂和嚣张气焰已被我打的差不多了。他新补来的兵战斗力已也差的多了。毛主席判断日本鬼子不能在耀武扬威疯狂多久了，不久将要完蛋了。同时考虑到日寇完蛋后国民党蒋介石一定会发动起内战来，为了党中央延安的安全，党中央决定将晋察冀的三个主力团——一分区一团（即狼牙山五战士团）三分区五团和平西分区的九团，调往延安。我们一团从完县刘家台出发前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向部队讲话。他说：“……现在交给你们一项重要任务，每人背一件宝贝去送给毛主席！送到延安去。……”当时我们猜测可能是金子，但实际上是每人一发山炮弹。我们把这个沉重的东西绑在背包上，从刘家台一路小心谨慎通过山西省诸县向延安背去。在开始时我们不觉得怎样重。可走一段路后，它可真不那么简单。背包带子勒得双肩的肉越勒越深，越深越疼，同志们的肩膀肿了起了。可我们知道“这是宝贝”所以大家咬着牙，忍着疼，通过几道敌人封锁线，走了一两千里，才好不容易背到了陕北。可到 1947 年我亲眼看到这山炮弹的威力。当胡宗南占领了延安后疯狂的追我们，当追到了瓦窑堡、沙家店时，敌人一个师钻进了彭大将军（彭德怀）布下的我军主力埋伏圈。我们向敌人发起了猛攻，但有一个主阵地（山头）敌人死守，我们炮兵瞄准敌人的炮兵阵地，只一发，就把敌人的炮兵打哑了。随即轰击敌人的主阵地。使我们迅速冲了上去，全歼了敌人的一个师。当时我想，说不定这发炮弹就是我背来的呢！

在日常生活中，你可能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日本鬼子是飞机加大炮，八路军是小米加步枪。”我在这里加一句：“小米吃不饱，步枪非常少。”为了从鬼子手中夺取武器，往往是为夺敌人一支步枪，我们可能要付出几个人的生命代价。可不是那么容易啊！为了想法子解决我军弹药的困难，边区也自造过一点子弹和手榴弹。那就是用捡回的弹壳，再去号召老百姓把过去买东西花的铜钱交上来做成子弹头的壳。里面在灌入锡和铅，再在弹壳中装入自己造的（当时是以一硝二磺三木炭的比例自制土火药）火药。可谁知自造的弹药威力很差，子弹打出去出枪口就拉稀（铅就向外流）。自制的手榴弹有时只把弹体炸成几瓣。杀伤力很差。所以我们和鬼子战斗主要是靠智慧和勇气另外加大刀刺刀并尽量多从鬼子手里去夺。有一首军歌：“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八年抗战随着

时间的延长，我们从敌人手中夺来的枪支越来越多，我军的武器装备也就步步改善，到1944年时，我们这个团的所有机枪、步枪基本上都换成了日本造的歪把子和三八大盖。我们调到陕北后，延属分区决定调我们这个连去守延安飞机场作仪仗队。当时我们从甘泉开到延安机场时，要通过延安南关街道。在我们进入延安市时，连长王林特意叫战士把机枪膛去枪衣、步枪都上上刺刀。然后雄纠纠的迈起整齐有力的步伐，唱起“前进前进，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军歌。一进大街，延安人民听说是从前线开来的正规部队，都争先恐后的挤在路两旁，亲眼目睹八路军正规军的雄姿。我听有的人在说：“我一生第一次看到这样精锐的部队。”这一次，我们给延安人民带来无穷的信心和力量。但要知道，我们的武器装备达到了和日本军队同等的水平，是经过七年多的浴血奋战用成千上万的烈士的鲜血生命换来的啊！

如果在日寇进攻中国时我八路军有这样的好武器装备。可以这样说，可以叫鬼子连黄河都过不了，就不会出现南京三十万军民被屠杀的悲剧！如果1941年时有这样的武器并有充足的子弹，那五壮士就会一直坚守在那座英雄的狼牙山上，就是有一万名鬼子也不可能叫他打上去，也就用不着跳悬崖了！

三是医药艰难。

在战斗中我总想，要么不要被打着，要么就被打死。因为我非常清楚负伤后没药治的艰难。伤员下来后连里只有一个卫生员，他身上最多是有点碘酒、红汞液（这是最好的了）。送到后方治疗时没有医生给动手术。外国来的白求恩、柯棣华等哪能顾了那么多伤员？医疗时多是用食盐水冲洗伤口。没有别的医药可用。我记得和我一起参军、后来又一起当班长的冯永庆同志在我们打紫荆关时，一块弹皮炸进了他的大腿深处，到后方也没有医生会开刀取出弹片，只好让伤口自己化脓，自己长伤口。一个多月后，伤口每天有大量的脓血外流，也只能用食盐水冲洗一下。后来万幸，因弹片打进皮肉时，棉裤的棉花也随弹片打入了腿中，随着脓血外流把棉花冲出了一点棉丝头，在用盐水冲洗时被发现了。就用手捏住棉丝头向外拉、拉、拉！几下子棉花裹着的弹片被拉了出来。然后这才慢慢的长肉使伤口平复起来。保住了一条命。这是非常幸运的啊！有很多负伤的同志都是因为没医药治疗，本来不该牺牲的战友却可惜牺牲了。

四，穿的衣服、鞋袜也很困难。

夏天是好过的，有件破军装，补补缝缝就能将就。可是冬天呢？怎么办？我记得冬天雪天来了时，给我们每人发二斤羊绒（羊毛）。这东西干什么呢？一是用一半絮在被子里，二是叫大家自己捻毛线织袜子御寒。我们用一个七八寸长的木棒做一个陀螺样的东西（我叫它是拨郎棒）。一手抓住羊毛，一手慢慢的抽动羊毛并拨动拨郎棒迅速的转动，抽成毛线。然后再找铁丝做成针去织袜子穿。可那时有相当多的同志不会织，就是会织的同志也因毛线不耐穿几天就烂了，所以冬天大多数同志只好光着脚过冬。至于鞋子，一年中不定期的能领到三五双，这都是边区各村妇女救国会发动本村妇女制作的。因不能充足供应，所以每个同志都必须对自己的鞋子反复缝补才行。我记得在 1942 年我连驻龙华县康家沟，这里为防鬼子袭击就派我班去沟口放军事哨。我们为早发现来袭的敌人除放步哨以外还要派半个班去敌人可能来的方向放游动哨。这时我就只穿着一双单鞋，带着半个班出去在雪地里游动两个多小时。不穿袜子只穿单鞋在雪地里走动，脚底是什么滋味，可想而知了。另外，1941 年日寇又来扫荡，因敌人太多，我们只有躲避，寻找战机。可是天上的雨下个不停，我的鞋子本来就因破补过了几次，又一遇水，鞋帮和鞋底都脱开了，没法子再穿，只好仍掉，光着脚跑路。就这样我光着脚在山路上走了十几里路，脚板被石头等物扎的流出了血。至于被子，虽然说是发了羊毛，但战士们谁都不愿絮进被子里。这主要是为了轻装，减轻身上负担的重量，尤其连阴下雨，背包越湿越沉，那时要想找到今天的塑料袋是没有可能的。我记得 1942 年冬我们住在崎峰庄，因敌人把房子烧光了，我们只好在严寒的冬夜睡进只剩三面墙的老房基中。头枕着背包，怀中搂着枪。白天上山去挖点荆条根点着火，冷了就坐起来烤一下。在这北风呼啸的严冬里，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后背寒”。冻得浑身发抖，被冻病的人常有发生。

八年抗战的胜利来之不易。

上面我所介绍的这点与日寇斗争的历史资料，在我的亲身经历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如果放眼全国，在八年的斗争中各个根据地的军民在各个战场上，以各种不停的手段同敌人所进行的那些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事迹，是难以叙述完的。同志们！你从我上

述这点反映局部情况的片断中可能已经感悟到，中华民族通过了八年抗战才取得的最后胜利实在是来之不易。

我全国军民，就是在那样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与武装到牙齿的日寇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壮大，最后硬是把疯狂一时、野蛮成性和惨无人道的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最后日本天皇不得不于 1945 年 8 月乞求投降。日本头号战犯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被远东法庭压上了审判台处予绞刑。其臭名则永远留在世上受人民永久唾骂，遗臭万年。

八年抗战的历史告诉人们，中国是不可战胜的！想通过侵略别国得到好处的人是决不会有好下场的，玩火者必自焚！生动的历史是对当今世人的善良忠告。

日本投降的喜讯，很快传遍世界各地，我中华各族人民终于重建了天日，全国人民眉开眼笑，欢心若狂。延安人民彻夜在大街上歌舞狂欢。他们敲着节奏整齐的锣鼓，一边跳，一边高呼：“日本小鬼子投降咱！投降咱！”这标志着我中华民族终于脱离了战火的苦难获得了解放和自由，结束了上百年来受世界列强欺侮的悲惨历史。但就在这里提醒人们，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魂仍在游荡。日本至今也没有真正心悦诚服的承认自己的侵略历史，并没真正认识到给世界——尤其是中国人民所带来的血泪痛苦是它的罪恶。道歉只停留在口头上。

在这里我特别希望年轻的人们千万不要忘记这段血泪史，不要忘记那段国耻，也不要忘记那些为我民族解放而流血牺牲的先辈们。忘记了这些就意味着背叛！我们年轻一代的人生活在我国这样一个兴旺发达蒸蒸日上的全国人民齐心合力奋斗向小康迈进的幸福今天，要经常回忆：“为什么只有不到一亿人口的日本小国敢大摇大摆的来欺侮我们这样一个四亿五千万人民的大国？其根源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团结，一盘散沙。民穷国弱。不团结就会挨欺侮，贫穷就要挨打！这是历史给我们中国人的教训和结论。

我们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努力奋斗，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世界上一流的强国，才能使敌人望而生畏，不敢轻举妄动，这样我们才能永远安全，才能为全世界人民的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

---

本文 7940 字。





## 拜老专访

# 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 ——听张永儒老先生谈生命历程

录入：宋云芳、何正军

整理：江 海

2006年11月10日下午，学堂专职干事唐鼎峰与北师大新义工秦维舟一起去环山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拜望张永儒老先生。

张老今年83岁了，是一位老革命，八岁开始接受私塾教育四年，十三岁到保定某印刷作坊当学徒三年，1940年参加八路军，入编晋察冀军区一分区第一团（即赫赫有名的“狼牙山五壮士”团）特务营当战士，1941年春到抗大二分校第三期学习。在抗日战争中曾参加百团大战及数次抗击日寇的扫荡，在解放战争中参加了保卫延安、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荔北、宜川瓦子街、西府、解放西安、解放兰州等有记载的超过八十次大小战役、战斗。出生入死，浴血奋战，是从枪林弹雨中冲过来的。解放后长期在军部任职，1955年授大尉军衔。1979年离休。晚年以读书、练字为乐，关心青年思想教育问题。

2005年春，张老与学堂相识，对学堂的行动给予了高度的赞赏和积极的支持。老人一生备尝艰辛，而人生信念劲节愈标，虽然晚年身体很多病（白内障，脑血栓，心肌梗等），但他坚强的意志、旷达的胸襟和深沉的情怀，每令年轻人振作不已。

是日天晴，风不大，但挟着寒气，让人缩神。下午3点过，我们快到老人楼下时，远远的看见张老已经拄着杖在等我们了。

---

## “等死” ——老病生死的问题

你们来我很高兴。到我这家，进门一看，看到什么吗？有什么特征？东西都赶不上现代化，没有现代化的东西。

我这从小的时候、十几岁就当兵，当兵打仗，跟日本人、跟国民党打仗，打仗以后，到现在老了，可以说是无能为力了吧，老气横秋，有点……我老了，脑子也不行了，我这有个特点，虽然脑血栓发作两次了，住了两次院，都是很重的、抢救过来的，但有个特点，我不像别人一样，别人脑血栓以后，脑子就不行了，我脑子很清醒。所以我跟他们年轻人玩扑克牌什么的，一圈下来他们出的什么、按什么顺序出的我都记得很清楚，血栓没有把我的脑子给破坏掉，这是一个很万幸的事。

这两个腿我都还能走，你看我走到我们那个活动室，每天我到那儿看报，来回路很长，走起来困难，我就买了一个小摩托，每天嘟嘟的就下去了。有人跟我说你不要骑那个，哪有八十多岁那么大年纪骑那个的呀？可我很轻松，我的手这个神经反应很灵敏，跟你们年轻人差不多。当兵那会儿时间长了，开坦克、开摩托、开汽车，开的多了，考这个驾驶证很容易，换别人不行，到这个年龄就搞不了了。

我从十几岁当兵打仗，打了……我登记的有八十多次战斗，这八十多次有好多是从死神那里捞出来，从虎口当中夺出来的，很不容易。所以**死活对我来说，已经是置之度外，随他怎么去，该怎么是怎么，随便哪天死**——昨天到活动室，一个老爷子问我：老张，你干什么？我说干什么、有什么干的呀，一个是老了，没事干，就是吃，这是一个，吃；再一个，就是等死了。哈哈哈哈哈，**“等死”，就是什么时候死不管他，那是老天的事，对我来说无所谓，就是这样。**所以心理很坦然，没负担，也不想吃好的，也不想穿好的，这衣服都是二三十年前做的，穿了二三十年的了，还在穿；家里也是这样，你看我家里，你到我家里一进门，看不到什么先进的、值钱的东西，都是破破旧旧的东西。

## “严师出高徒” ——启蒙教育及其影响

我当年是这样，上学的时候不是个好学生，不好好学习，小时候，也不爱学习。哎，家里很苦，吃不上饭，在河北满城县寺角村。家里很苦，没饭吃，整天就……饿肚子，那时一亩地才打四十斤麦子，就不错了——现在一亩地打五百斤、八百斤，差几十倍——麦子没熟就赶快割下来吃，吃完了就过一天算一天，我就在那个情况下上的学。

那时学《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千字文》，念了这个以后才学别的，没有学过太高深的东西。老师来上课，怎么办呢？他坐一个凳子上，我们拿书上前去给老师敬个礼，就开始学念。念对了，他就教你第二行。念完后老师还问说：记住了吗？记住了回去读去吧。一个一个地教，教完后，你拿了书起来再给老师行个礼。回去后就“赵钱孙李”地背。他也不讲啊，也不解释，他不管你这些东西，我们现在说的就是教死书本，他完成他的任务就行了，至于说这个字怎么用，他不跟你说，不管了。**所以为什么我老是要翻这些书本，反复地看，现在翻来翻去的看？就是以前教的时候识字了，但好多东西并没理解，通过这么多年的生活，七十多年前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我上的课，老师讲的很多东西，头脑里还有印象。古代的好多东西，你往深里研究，无穷无尽，没有止境。学习这些东西，你越学越觉得它有意思、有名堂，尤其跟生活结合起来，越体会它，越觉得有意思。**那时候是讨厌它，不想念，不想念但老师打啊，怕啊，进学堂像进阎罗殿一样的。跨学堂门那一步，真是不想进去，但是老人逼着你去呀；到了那之后，就由老师管了，还是不由你。老师什么时候叫你走你才能走，老师不叫你走，你就走不成。学起来很苦恼。

有一次，老师叫我们写大字，每天老师到教室之前你先写一篇大字，也用字帖。你买的字帖和他买的字帖都不一样，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有的没钱买字帖，老师写一篇交给你，你就照着老师的写。有一个人呢，大概是写得不好，他就把写的字给撕了，撕了装到兜里去不就得了嘛？他呢（把纸）带到厕所去了，结果老师解手的时候看到里面有个字，那不得了了，这是对孔圣人的一种巨大的侮辱！被抓住了——现在你可以带着报纸上厕所，随使用，那时候可不敢！一个字，圣人的东西……你要“爱惜字纸”——

老师双手一拍着桌子，问：“是哪个上厕所挟上它？！是不是你？不是；是不是你？”问了一遍，谁也不敢吱声。“过来！”第一个拉过来，用一个板子，“啪！啪！啪！”三板子下去，手就马上肿起来了。“回去！”轮着来，四十个人打一圈，每个人都打一遍，谁也不承认是自己干的，谁也不说，再打一圈。打到第二圈，还没打完，打了一部分后，有一个叫“张景清”的同学，同姓的，当年的老师我叫他大伯，张景清是我叔叔辈，跟老师同辈的，叫老哥子，这样打了他两次，他就不干了，他火了，就骂老师，夺了老师的尺子就往家跑，跑了老师就追，一直追到他家去，所以大家就“解放”了，不打了。哈哈……

挨打了回去还不敢给家里讲，家里与老师是互相通气的：你不好好学习，老师当然要打你了！就这样的。学习那时候是很苦的。但是呢，也不能完全否定老师严格的要求。老师对我来说，启蒙教育给我创造了相当好的条件，对我后来的学习，到现在我的，还都是在老师教的基础上学的，没那些基础，我后来也、我现在……所以也很感谢老师当时打我们，小时候恨老师，现在大了知道那时候老师（好），所以我回家后有时候到老师家去拜访拜访他，并不恨那老师，老师教我们，打了也是应该，因为我没学好嘛，他是叫你学好啊，后来才知道。他愿望是你学好啊，“恨铁不成钢”嘛！恨你学得不好，打你是为了让你好好学。写那个大字，一笔也要写好；有一笔马虎了，一笔下来没写好，拿给老师看了以后，老师就打，用这么一把一尺多长的戒尺。所以后来慢慢地……

你一笔下来没写好，老师就要打你。那时候就是以打为基本的要求方式，不是别的，也不跟你讲道理。打是因为你，就是因为你没弄好，你的字没写好，或者你的字没写下来，这就是道理，没别的道理。

**通过我的体会，现在呢我就给他们讲，老师要求越严越好，但是你不要打他，讲道理批评他教育他。越严越好，“严师出高徒”，这几个字我是体会到了，所以我跟孩子家长看法不一样，没有严师出不了高徒。我现在为什么……我就上了四年学，我们现在单位几千人，博士硕士多的很，写字能写过我的，还不多。呵呵……他们跟我说，你没上多少学，为什么能写好呢？我说我感谢我的老师，老师对我的严格要求起的作用，他教我一丝不苟，一笔都不能马虎，不止是写字，而且锻炼了我一种思想，做任何工作我都一丝不苟，我都不敢马虎，这个思想教育根子就扎得这么深，反映在各个方面，不敢马虎。现在孩子马马虎虎，他们做事情，马马虎虎，不求甚解，我很看不**

惯，我说不行，一定是认真，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你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要这样子。老师这个思想已经贯彻到我的日常生活里面了。它起的作用不仅是学生的学习问题，而且还对我的工作……最后自然就形成了这些结果。

当时的老师，如果说，您当时给我讲这个道理，你比如说，《三字经》里面，“三才者，天地人”……你给我讲讲古代的这些、三皇是谁？伏羲、神农……讲讲这些东西我就高兴了，那是什么东西都不懂啊，你要是用讲道理的办法来——他就不跟你讲道理，就是打，错就错在这一点。要用**严格、严的办法，又讲道理，那就好了**。应该用思想启发的方式。现在你们已经享受到这一点了，在学堂这样；我们那时候没享受这个啊，可惜就可惜这一点。

你看，这是我写的这几个（小楷），这样的写了很多。这一张，你看为什么成这样子呢（残缺）？这是废了。我写字，它错一个字，我都不干，写一笔坏了，我马上把这个纸割掉，重新来。我有一个字写错了，哪怕写了这么多，突然下边写了错字，一个字写错了，马上就不要了，全篇作废！纸没有了，再拿新纸，重新写。**一笔一画都不能马虎，严格要求自己，这是对自己的要求。这跟老师的要求是直接起作用的。当时没有老师那个要求，我现在不会这样。后来我打仗，打枪啊，打枪打得很准。为什么呢？也是这个问题。呵呵呵呵……**

这个严格，“严师出高徒”，这个体会非常深。要是没有老师的严格要求，我绝对写不出现在这个字来。**一笔不行，我自己都要毁掉，得按老师的要求来；就是没老师，也像老师要求我一样。**

工作也是一样，有些工作、现在学的些东西啊（没弄明白）……睡不着，半夜睡不着，一个事情没解决了，三更半夜、有时通夜不睡。为什么呀？就是总觉得这件事没做好。没做好的话，都觉着过不去这一天，第二天怎么也要要想尽一切办法补救、考虑这个事情。**做一件事，这件事就一定要做得好；没做好，我就总觉着自己对不起这个事，非要认真想把他做好、拉倒——这是自觉的，不是别人逼迫的。基础就是老师那会逼的，逼我要往好做的，就成了现在这个状态，从写字到工作。不行，怎么办？要有一种要求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啊，而且是坚持到底的精神压到你身上来。**

## “朝闻道，夕死可矣”

### ——学习的态度

从教育上来说呀，我的体会，经过老师们，我体会最深。启蒙小孩子，你脑子里都有些什么，我就这些是体会最深的，严格，坚持学习。所以到现在，我的孩子来了以后，他不好好学习，我就说他，我说你看看我，我八十多岁了，每天你回来以后，只要你一进我这房子，看我在干什么？不是写字我就看书，一天不闲着！学习一天，差不多有四万字。看报纸、书籍，一天就四万字吧。

我对我自己呢，是这样的，你看人家艰苦奋斗都那么过的。我呢，八十岁了，我也不放松，还在学。尽管是没用的，可能今天学到的东西，明天没作用，我知道没作用，社会上也不会请我干什么，我也干不了什么，但是在我脑袋里，我学一天东西，多一点知识，对我还是有作用的。我就联系到孔夫子的一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早晨起来，学到的东西，哪怕晚上死了，也不遗憾。这是孔夫子的话。

所以说现在老了，是没用的，我知道是没用的，起不到多大的作用，也确实用处不大，你能干什么？天天生活，除了工作以外，除了吃饭，就等死？不能，是不是？还得想着奋斗。过去咱们奋斗过来，现在还在奋斗，“奋斗终身”嘛！

##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 ——艰苦岁月

我读了四年多书，到十三岁供不起了，家中又增加了一个弟弟、三个妹妹，生活更加艰难了。父母只好叫我辍学，帮老人下地种田。可是靠天收成的那几亩薄田产量没法提高。父母无奈就把我送到保定，托人介绍到一家印刷作坊里当学徒（童工），这时我还是个十三岁的孩子。当学徒，学印刷。学了三年印刷，刚要出徒了——出徒以后就要给工资、给点工钱了，前三年都是白给人家干的，给人家干了很多活。在当学徒那时候是很苦的，一天要我干十六个钟头的工作，那是很平常的，有时候二十个小时，甚至于连轴转，头天干到第二天，吃顿饭，还得继续干，根本不叫你休息，那是很苦的。当时白天在这个案子上印刷，晚上就在上面睡觉，我裹个被子睡在上面，早上醒来一看，怎

么睡在地下？原来从案子上滚下来了，就那样，摔地上都醒不了，累成那样子；等累得没办法了，就跑厕所解个手，等跑厕所里，蹲下去就睡着了，就累成那样！

当了三年的学徒，三年中除了每天吃他三顿杂合面窝窝头外，其他衣服、被子等用品都是我父母给的。到底三年我给老板创下了多少财富，只有天知道。我临走时老板给了我一元五角钱的河北省纸币，就算我三年的工资，实际上连回家路费也不够，这一元五角钱在当时只能买 15 斤玉米面。

刚要出徒，遇上日寇侵占了华北，我从保定回到家中，家中生活更难度日。只好又辞别父老外出自己挣口饭吃。日本占了北京以后，我在门头沟装过煤，挖过煤，抬过煤，用扁担两个人抬着，装火车，也是很辛苦。

就这样，因成年累月地负重劳动，我的右肩膀已经被压的严重变形，只要脱下上衣你就可以看到我的右肩比左肩要低一两寸。这就是我一生苦难留下的痕迹的一部分。

上学之前，家里生活条件很艰苦，后来上学，也很苦，当学徒、当工人仍然艰苦……老百姓吃不上，艰苦，当工人，学徒，艰苦，打起仗来那更不用说，艰苦，你看那个红军长征展览会（指“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展览”）……一辈子是苦过来，那么多磨难，活过来是万幸的。打仗那个时候牺牲那么多人……牺牲那是真的，人的牺牲是真的太大，就从我说，我当兵的时候，班里战士死的人，好多地方的。家里头、村里头都不知道这个烈士，有好多我给他们写信都不知道，有的现在还没找到，找不到。你怎么知道？没名字。还有的参军后，上午还不知道名字呢，下午就牺牲了。

打仗（抗日战争）那时候那个艰苦……一年当中（我们）有三四个月都要在野地里睡觉在山沟里睡觉，不进老百姓村子里面睡觉，都在青纱帐里面躺着睡觉。太冷了冬天太冷了，睡觉被子里面没多少棉花的，一个人被子里头说是规定给一斤棉花蓄在被子里头，实际上战士们也不要那么多，为什么不要那么多呢，下了雨淋湿了背不动，经常背的尽量减轻，减轻行装，所以我们那时候经常不打开被子睡觉，盖被子的时候很少很少的，被子都是垫在头下当枕头的。把枪一搂，头一枕，就那么睡了，地上铺垫点草就这么睡了，所以我们在外面睡觉。放哨回来以后，大家都在那烤火，所以我后来想啊，真是像那时候写的一首诗一样，火烤身前暖，风吹背后寒。确实是这样，烤过这边冷了以后再烤这边，就在那个环境下生活。

睡觉的时候不能进老百姓的房子，咋不进老百姓房子？老百姓房子啊……好多个村



子，都被敌人烧光了，日本鬼子进来以后，到边区来以后，我们住的地方他每一年都要有那么几次扫荡，既然知道这个地方是我们住过的，老百姓一律遭殃！我以前看到良岗村（易县），这个村有一千多户人家，最后我们去了以后基本上给烧光了，都成了一片焦土。就是剩下来的房子，我们去了以后还有老百姓，里头还有年老的，家里有孩子，军队你怎么把老百姓的房子给占了呢？所以我们只有在野地里头生活，不敢住老百姓房子里去。

（因条件限制，关于张老回忆战争年代亲身经历的故事，学堂将以其他媒介另作刊载。）

……这样的战斗中，这么多年，我们的胜利很不容易。所以有首歌：**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映照着烈士的鲜血，为了挽救垂危的中华民族，他们在顽强的战斗不歇。**我们祖国的胜利是用烈士的鲜血给我们铸成的。我很满足我现在的的生活，虽然我现在也吃不好，我也不想吃那么好。晚上熬玉米粥，早上吃一个馒头就一点牛奶，中午就是米饭炒一个菜，我就觉得很满足。我们现在吃的这么好，永远不能忘记那些烈士们给我们创造的这些条件。如果没有烈士的英勇奋斗，多少人的奋斗牺牲，就没有我们现在的的生活。

###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 **——人生价值观**

（文革期间）那时候有点思想，有点想法，革命，革命，打到自己头上来，把自己的国家……咱这不是反革命么，是不是？有这样的怨恨，但是呢，基本上这个思想啊，并不是自己就算了，不干了，还是想法把我们国家的政权巩固下去，不叫它倒台。不能放松，不能扔掉这、得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立场是坚定的，不管受多大的委屈。

**“读诗书以自慰，作书画以消愁。开荒山以健体，种瓜树以解忧。**

**或奔深山采药观景，或下湖河捕鱼泛舟。不怕脏苦劳累，不惧日晒汗流。**

**以刚正不阿对人处事，不阿谀奉承低头乞求。**

**不和别人比阔比富，不跟坏人随波逐流。**

**宁愿一生贫穷、忍饥受冻，不以邪门歪道向富贵追求。**

**心烦时即多回忆往事，有多少战友身残掉头？！**

**要和忠良善士交朋友，并和阴险奸辈结冤仇。**

**一生以助人为乐，正正直直，走到生命的尽头！”**

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最严重的时候，67年，自己看书，看《古文观止》，从头到尾看了两遍，有一个启发，就写这篇东西。我永远读书，还要读诗书！当时很危险，我不管你，我还要看，我自己安慰自己嘛，我写书画，坚持写。

前几年我看到一个香河肉身的文章后，就写了一句话：我张永儒，一生不信神不信鬼，但我相信古人说的一句话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不报，时刻不到”，我七八岁上学，读一本书叫《名贤集》，其中有“善恶到头终有报，只是来早与来迟”。**我一生坚持多做好事、善事，不做坏事，忠实地为人民服务，正正直直地做人，不搞邪门歪道，我相信终会得到善果的。**事实上在我的一生中已经有多次善果出现过了，还会出现的。那次看了，给我的一个体会，给我的启发，一个信念，做好事总是有好报的。**好人得不到好报也许有的，我不管，做好事，尽我的本分。**

我这个人呢，过去可以说一直跟着共产党走这么一辈子，多半辈子了，尽是为人民服务了，到现在为止，有很多事情，你叫我干什么事情，人家叫我，只要我能够干的，决不推辞！不要任何报酬，也不需要什么东西（条件），而且帮人家干好为止。现在都是这样，干了以后呢，助人为乐，心里痛快，就图这个。

### **两个传统：“宜未雨而绸缪，勿临渴而掘井”**

#### **——关于当前思想教育**

昨天晚上有看到一个《法制晚报》的一个报道，儿子杀自己妈妈，把妈妈杀掉了！我们有一个同志，在延安时候的一个同志——也是狼牙山五壮士（团）之一的，我们一起调到延安，后来退伍回家了，他家两个儿子，不让他吃饭，还把他房子给占了。这就

是狼牙山五壮士团的战士，打完日本，又到延安去保卫延安，最后落了这么个下场，老了没有饭吃，房子被霸占了。**在我们老一代来说，不管怎么样，对老人我们是讲究孝的。我总想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对自己老人为什么那么恨？父母之恩父母之情哪去了呢？怎么就都忘了呢！**所以现在不从思想上解决这个问题是不行的，用孔子的思想教育下一代，从思想根子上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你们搞这个义举，办这个学堂，我觉得很有必要。

你看我这个袜子，这袜子它破了，对，这是我自己补的。我老伴的袜子我也给她补的，它破了，仍了，可惜了。破了我再补，有窟窿就补，我不扔它。你扔了可惜了，我们现在这个袜子质量不好，穿两天，它就破窟窿，所以就是这样啊。缝，缝，缝，破窟窿就缝，一双袜子不停的缝……这是个为什么呢？这个思想也可以说是来自周总理、周恩来，我说我最崇敬的国家领导人里头，最深刻、最崇敬的人是周恩来……周恩来那个艰苦奋斗，那衣服补了又补，那么大的国家干部、国家领导，穿那个衣服，都是补的。**——我最崇敬的是周总理，我说我就是一辈子，总理的别的才智没法学，我学不到、赶不上去，但是，这个艰苦奋斗这一点上，我可以学，完全贯彻这个思想，把这个精神，贯彻到我身上来！**

现在这个问题啊，很危险，把过去的东西都忘了，都丢了。所以说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走的是背叛的路，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想到这个地方呢，我很同情这个事（指学堂的事业），必须要解决，过去讲的有一句话叫什么，“技术上天，红旗落地”，倒了，红旗垮了。那是文化大革命时候讲的这个话，现在体会到还是很重要的。弄不好真要垮的，我很担心这一点。现在人的思想扭曲到这个程度，没有一天太平的，看报纸，学校一个学生捅了四个学生，在旧社会什么时候出现过这种情况？不可想象。

现在我跟你们思想很统一，不解决不行，解决办法是什么呢。用孔子的办法看能不能把这个问题收回来，“德”，“仁”，这方面去教育孩子，从小时候就开始教育孩子，我们小时候，那时候老师不是讲嘛，做好事情，“**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生做好事，不要做坏事，从小时候种下这个种子了，这是一个传统，从文化传统里边，中华民族这个传统；再就是我们的后辈，现在这个斗争的传统（革命传统），“艰苦奋斗”，这个传统——你要是不理解长征，几十万人到最后几万人，好多人死在路上，到底为什么？

穿不上衣服，没鞋子穿光着脚板走，吃不上，吃草，吃树皮，为什么？我才讲那些东西（指抗战期间的故事），因为我们很靠近，我们抗战虽然没有吃树皮草根，那也差不多的啊，接近那个生活。好多次都没没有饭吃，我们好几天吃不上一顿饭的时候——这两个传统能把他继承下来。《名贤集》上有句话怎么说的？“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还有《朱子治家格言》里“宜未雨而绸缪，勿临渴而掘井”，这些思想都是教人打基础，人必须要站在牢固的基础上。《名贤集》上写了好多这方面的。咱们大家都往这方面做，不就好了么？！就怕不……

###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 ——寄学堂青年

我的体会，不管人这一生怎么样，一个人首先要有志，有志气。你们也是一样的，一定要坚持下去，你们做的这个工作很不好做，万事开头难，创业难。但是突破、度过这个难关以后，那可能是多少年以后的事情，总要有个好结果的。我相信这一点。**有坚定的信念，不管干什么事情我要干好干成！我现在年老了，我要年轻三十年，我要是五十岁、六十岁，我还要跟你们一块拼！一块干去！**现在干不动了，“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是我现在的状态。

奋斗是不容易的，你看抗日战争打日本打了几年？不容易。红军，你们看了，不容易。中国革命上百年，从鸦片战争开始，到现在多少年？打那么多年，受苦受难，死那么多人，成千上万、成千上万，一批一批的，一代一代地打下去，多么难呐！这个创业呀，打到现在真不容易！中国人民到现在，有吃有穿，全国人民富起来了，别人也不敢欺负我们了，很不容易！**这个创业不是经过了一个人，而是几代人，千千万万的人牺牲后打下来的结果。无论如何，咱们青年人一定要保下去，继续奋斗下去，保持一个正确的方向干下去！**《弟子规》上说“流俗众，仁者希”，这个思想工作不好做，还是那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遇到困难，想想红军，想想革命的艰苦，你们现在教育青年人、教育下一代，努力奋斗，可以给后来人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松柏精神。”

离开张老家，走在华灯初上的街道上，脑袋里忽然冒出这四个字。

还记得 05 年春，张老从环山村骑自行车第一次来到学堂时的情形，他坚持称呼我们这些年轻人为老师，而自己则谦称“学堂学生”——然而他 1979 年离休的时候，我还没出世呢！

还记得张老在参加学堂周末学习时，谈到早年学《名贤集》的记忆，又说到“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的问题，的确道出了旧社会的一些现实，但作为警句教育孩子的不合适，不如用“志短人穷，马瘦毛长”的好。

张老抄写了许多的“劝学警句”，都是历代的名言，像“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不经苦中苦，难得甜中甜”等，大家耳熟能详，没有什么特别的，但这都是他用一生经历锻炼过来的，读来仿佛看到文字后面的血肉……

整理这次访谈和有关张老资料时，我们几位未得见张老的义工，都产生了欣慕而想见其人的心情。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生命，就有这样孕养和感召的力量。

松柏长青！